全球對話

13.1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種語言刊出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與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談社會學

Breno Bringel
Carolina Vestena
Vitória Gonzalez

朝第二十屆ISA全球社會學大會出發

Sari Hanafi
Anahí Viladrich
Geoffrey Pleyers
Rosana Pinheiro-Machado
Tatiana Vargas-Maia

多重宇宙與生態社會學轉型

Maristella Svampa, Alberto Acosta, Enrique Viale, Breno Bringel, Miriam Lang, Raphael Hoetmer, Carmen Aliaga, Liliana Buitrago, Vandana Shiva, Mónica Chuji, Grimaldo Rengifo, Eduardo Gudynas, Lesley Le Grange, Christelle Terreblanche, Cormac Cullinan

理論觀點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議題開講

> 開放科學的挑戰
> 多重社會學的南方概念
> 拉丁美洲社會學與當代文明的危機
> 破碎的巴西
> 伊朗：這不是抗議，而是一場革命

GD 第13卷 /第1期 / 2023.04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主編的話

我感到很榮幸能歡迎各位讀者來到2023年的第一期刊物，這也是我們新團隊在全球對話的首次成果。2022年末，從ISA副主席 Eloísa Martín 那兒得知我將擔任本刊的新任主編時，我感到非常興奮。我想感謝由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的領導的前一個編輯團隊，在他們的努力下，這次交接格外地順暢。我也要謝謝助理編輯 Raphael Deindl、Johanna Grubner、Walid Ibrahim 以及 Christine Schickert，他們在過去幾年內對這本刊物付出許多，並有豐碩的成果。Aulenbacher 和 Dörre 教授將繼續在團隊中服務，而創刊編輯 Michael Burawoy 也將持續擔任編輯顧問。這些人對於本刊接下來的發展與改革，將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我們的管理編輯 Lola Busuttil 是本刊物團隊最資深的人員之一，他確保了這次交接的順利，也將和 August Bagà、Toffa Evans，以及來自各國、致力貢獻的編輯，一同成為本團隊最堅實的力量。

自2010年發行以來，全球對話有顯著的成長。全球對話最初只是以手工製作的報紙形式發行，觸及範圍相較有限。十多年後，全球對話成為了以超過十二種語言發行的刊物，其中的稿件來源橫跨全球，讓各地的社會學家有機會在此互相學習、分享其他地區的世界、研究成果以及當代社會議題。

我們應該持續鞏固、拓展這項重要的成果。我們目前已經確立了全球對話接下來的三個主要目標：由ISA甚至ISA之外出發，推廣公共與全球社會學、重建並加強全球對話編輯專題的穩定、重構交流與傳播的策略。

對於上述目標我有許多想法，不過在執行他們之前，我也想聽聽你們的意見。為此，從現在開始到明年6月在墨爾本舉行的第二十屆ISA世界社會學大會，我將在助理編輯 Carolina Vestena 和 Vitória Gonzalez 的協助下，於ISA社群內展開討論。兩人都是出色的全球年輕社會科學家，具有編輯經驗、致力於公共社會學。Carolina 以及 Vitória 目前分別身在德國卡塞爾和巴西里約熱內盧。

本期刊物以一場訪談為開頭，受訪者為本刊前編輯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其中，他們解釋自己如何將公共社會學轉化於自身的研究議程，也分享了兩人在擔任全球對話編輯時面臨的挑戰，以及如何理解從公共到全球社會學的走向。

第一個專題著眼於澳洲下一次的ISA大會。Sari Hanafi 介紹本次大會的一些主要議題，Anahí Viladrich 反思如今正過渡於線上與線下形式之間的世界。Geoffrey Pleyers 則討論當代全球社會學面臨的核心挑戰，以及ISA能如何面對這些挑戰。Rosana Pinheiro-Machado 和 Tatiana Vargas-Maia 的文章則觸及了大會的核心議題之一——當代威權主義，並探討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研究當代的極右勢力。

第二個專題的主要目標，是為 Ashish Kothari、Ariel Salleh、Arturo Escobar、Federico Demaria和 Alberto Acosta 等人跨地域共同完成的一項成果：《後發展辭典——Pluriverse》提高關注度。在本專題內這些令人振奮的作品中，我們將會收錄傑出行動份子與知識分子的短文，以呈現全球對話的潛力。這些作品的主題包含：發展的替代方案（Vandana Shiva）、美好生活（Mónica Chuji、Grimaldo Rengifo 和 Eduardo Gudynas）、烏班圖（Lesley Le Grange）、生態女權主義（Christelle Terreblanche）和自然權利（Cormac Cullinan）。此外，南方生態社會與文化公約的成員（Maristella Svampa、Alberto Acosta、Enrique Viale、Miriam Lang、Raphael Hoetmer、Carmen Aliaga、Liliana Buitrago，還有我）也共同撰寫了一篇文章，討論生態社會轉型的地緣政治。在文章裡頭，我們批判北方主導的霸權式生態轉型如何塑造新的環境剝削，其不只使生態債務不斷積累，更強化了綠色殖民主義、擴大了全球南方的犧牲。相關的替代方案，也將是這篇文章和本專題的主要焦點。

在理論專題中，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嘗試探問後疫情世界是否導致新的現代性產生。他對於國家發展趨勢、經濟與社會政策的的歷史學／社會學分析，將協助我們跳脫出對於疫情的那套俗爛解釋。

最後，於議題開講中，我們結合了三篇文章，介紹當代社會學遭遇的不同挑戰。Fernanda Beigel 討論了社會科學如何面對開放科學的要求，並展示其研究結果及過程。Mahmoud Dhaouadi 提出了涉及多元社會學的南方概念；而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的成員，則試圖於文中分析當代文明的危機和社會學在當地的作用。另外，還有兩篇文章以巴西和伊朗的情勢為主題。其一是由 Elísio Estanque 和 Agnaldo de Sousa Barbosa 撰寫，他們認為要理解巴西目前兩極分化的現象，需要將時間跨度拉得更長。為了作者的生命安危，第二篇文章以化名發表，其針對伊朗最近的抗爭進行分析。我們不能將這些情況正常化，也不能在面對猖獗的獨裁主義時保持沉默。全球對話將繼續致力於嚴謹的社會學分析，同時向全球的不公義現象聲明立場——我們支持新的國際主義！■

Breno Bringel，《全球對話》編輯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 GD 網站。

> 投稿來信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 編輯團隊

主編: Breno Bringel.

助理編輯: 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主編: Christopher Evans.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媒體顧問: Juan Lejárraga.

顧問編輯: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Nazanin Shahrokni.

各國編輯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亞)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sio.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Abdur Rashid, Sarker Sohel Rana, Md. Shahidul Islam,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Yasmin Sultana, Ruma Parvin, Sharmin Akter Shapla,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Farheen Akter Bhuian, Khadiza Khatun, Aysha Siddique Humaira, Arifur Rahaman, Istiaq Nur Muhit, Md. Shahin Aktar.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Ricardo Visser,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Rakesh Rana, Manish Yadav, Pragya Sharm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Elham Shushtarizade.

哈薩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蘭: Aleksandra Biernacka, Joanna Bednarek, Anna Turner, Marta Blaszczynska, Urszula Jarecka.

羅馬尼亞: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 Mihăilă, Diana Moga, Luiza Nistor, Ruxandra Păduraru, Maria Vlăsceanu.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臺灣: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廖宇雯, 黃翊碩, 簡芊楹, 郭智豪, 賴奕瑋, 林韻柔, 周芸瑄.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這場訪談中，**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的討論聚焦於公共及全球社會學的一些挑戰，以及這兩個概念如何在兩人的研究議程以及《全球對話》中發揮作用。

本專題以**第二十屆ISA世界社會學大會**為主題，其中的文章反思這場活動的一些核心主題，例如當面開會以及結合線上線下的開會形式面臨的挑戰、全球社會學和全球對話的革新，以及極右派的發展。

多元宇宙和生態社會學轉型的專題，則探討了一些相關的核心概念，如 Buen Vivir、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綠色協定、自然權利和 ubuntu。

封面照片來源：Pixabay。

GD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主編的話 2

> 社會學對話

公共與全球社會學的挑戰：專訪 Brigitte Aulenbacher 與 Klaus Dörre
Breno Bringel，巴西／西班牙；Carolina Vestena，德國；以及 Vitória Gonzalez，巴西 5

> 朝第二十屆ISA世界社會學大會出發

歡迎參加於墨爾本舉辦的第二十屆 ISA 社會學世界大會
Sari Hanafi，黎巴嫩 8

後疫情時代：重燃對於實體會議的信心
Anahí Viladrich，美國 11

全球社會學作為一種嶄新的全球對話
Geoffrey Pleyers，比利時 13

為什麼我們需要新的架構研究全球南方的極右派
Rosana Pinheiro-Machado，愛爾蘭；
Tatiana Vargas-Maia，巴西 16

> 多重宇宙與生態社會學轉型

綠色協定與生態社會轉型的地理政治學
Maristella Svampa 和 Enrique Viale，阿根廷；Alberto Acosta 和 Miriam Lang，厄瓜多；Breno Bringel，巴西／西班牙；Raphael Hoetmer，秘魯；Carmen Aliaga，玻利維亞；以及Liliana Buitrago，委內瑞拉 19

為了百分之一的發展
Vandana Shiva，印度 23

「Buen Vivir」：系譜學和展望
Mónica Chuji，厄瓜多；Grimaldo Rengifo，秘魯；以及
Eduardo Gudynas，烏拉圭 25

Ubuntu: 一種正義且賦權的概念及其生活方式
Lesley Le Grange，南非 27

爬梳生態女性主義辯論
Christelle Terreblanche，南非 29

自然權利與地球法學
Cormac Cullinan，南非 31

> 理論觀點

後疫情趨勢與現代性的諸階段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巴西 33

> 議題開講

(重新)開放社會科學：開放科學的挑戰
Fernanda Beigel，阿根廷 36

多重社會學的南方概念
Mahmoud Dhaouadi，突尼西亞 39

拉丁美洲社會學與當代文明危機
拉丁美洲社會學學會 40

破碎的巴西
Elísio Estanque，葡萄牙；
Agnaldo de Sousa Barbosa，巴西 42

伊朗：這不是抗議，是革命
伊朗之聲，伊朗 44

『隨著社會階層兩極化的時代來臨，我們將逐漸不再有辦法進行理性的公共辯論。』

Sari Hanafi

> 公共與全球社會學的挑戰：

專訪 Brigitte Aulenbacher 與 Klaus Dörre

Breno Bringel，全球對話日後的主編，以及 **Carolina Vestena 和 Vitória Gonzalez**，全球對話日後的助理編輯

Brigitte Aulenbacher。來源：人事檔案。

Klaus Dörre。來源：人事檔案。

全球對話編輯（GDE）：你是如何將自身的在地網絡、於ISA的跨國參與，以及公共社會學的概念與你的研究議程結合的？

Brigitte Aulenbacher（BA）：透過公共社會學的概念，科學知識得以被傳播，也刺激了學術／非學術受眾之間的對話，使得社會學的學術工作能承接不同社會領域的討論。以提出此概念的 Michael Burawoy 的角度來說，公共社會學即是用來描述社會學家提供他們的科學知識（「傳統」公共社會學），或是參與由公民社會發起的倡議（「有機」公共社會學）。作為一名批判社會學家，我的議程有兩個面向：其一是將社會理論，特別是從女性主義和交織性來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其二是結合工作、勞動、照護與科學轉型的實證研究——這包含數位化、家務勞動和老年家庭照護、住宅照護、高教市場化等現象。我們可以第二個全球化時代（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視為一個轉折點，因為我們正見證資本主義的轉型、其最終導致的經濟、生態、社會與政治危機，以及隨之而引發的大量抗議活動。

就我的理解，這樣的發展是起因於人們忽視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因素。資本主義經濟根植於現代歐洲中心主義與對等中心主義，即人類應該要藉由人、科學技術的進步，試圖掌握人、自然、競爭、成長。在積累、利潤和市場驅動的生產模式下，資本主義經濟不只將生態與社會需求視為次要的，也透過制定物品的價格，將生態、社會需求拋到腦後。這些與性別、種族與階級的支配相輔相成。從氣候變化、日益加劇的貧窮、四溢的不平等現象來看，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負

>>

面影響，以及其引發的政治效應——如全球各地竄出的專制體制——皆是顯而易見的。在奧地利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之下，我們重新拾起波蘭尼的現代經典，也成立了國際波蘭尼協會，希望能善用其對市場資本主義歷史的見解——市場本位主義可能對生態、勞動、貨幣造成什麼破壞？我們可以利用什麼樣的知識、關懷或其他所謂的「虛構商品」？如何結合各種反抗，例如由工會為代表的勞動社會運動、週五為未來而戰運動、照護倡議等等，一同抵抗新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帶來的災難。不管是在地還是跨國網絡，甚至是全球對話專題中，公共社會學都將以社會學理論、實踐與政治等多個面向，來分析新自由主義底下正轉型的資本主義、工作與勞動、照護與科學。

在我們這個領域中，對於社會學是否、應該以及如何走向公眾，還相當缺乏共識。我們應該只是觀察、分析和描述社會發展，還是應該插手干預？由於社會學也是社會——其研究對象——的一部分，無論是當代發展的反思、分析，還是針對人們的活動，學者們都沒有任何立場告訴人們必須做什麼。但是，社會學家可以提供科學知識，激發辯論，作為研究者，也可以成為不同行動者聯盟的一員，一同協商未來的前景，以及保障、維持生計的方式。在我的研究領域中，就有許多人和博物館、公共教育機構、教會、工會或其他機構合作。全球對話匯集了世界各地的文章，對在地和國際層面的討論都是有意義的。

Klaus Dörre (KD)：我自己第一次接觸到 Michael Burawoy 的公共社會學，是在2012年一次於約堡舉辦的 SWOP 會議上。在那之前，在使用德語的社會學界中，不太有人知道這個概念。我當時立刻就覺得：就是這個！在公共社會學小組的辯論中，我認知到這個取逕能夠為研究概念提供創新，且這和我研究團隊在做的事情有一定程度的接近。於是，我和 Brigitte Aulenbacher 等人試圖將有關公共社會學的辯論帶入迄今為止有些無知的德語社會學界，雖然學科內仍有許多人持保留意見，不過我們還是成功了。在耶拿，公共社會學的概念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標準。這也適用於我的研究小組，比如說，我們就從有機公共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勞動關係和工會。

在有機公共社會學方面，我目前最為重要的經驗是與氣候運動左翼團體的緊密合作。受到德國萊比錫有1500人參加的「學生為未來」組織啟發，我寫了《Die Utopie des Sozialismus: Kompass für eine Nachhaltigkeitsrevolution》(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持續發展革命的指南針》一書，這本書在氣候運動中有廣大的迴響。我和這些學生一起開始了「由下而上改革社會主義政治」活動。我們正在研究那些於在地成功實行解放社會主義政治的案例，有的案例需要直面主流趨勢的抵抗，這些抵抗的力量甚至可能來自全世界。除了德國的工作小組，巴西、阿根廷、智利、法國、希臘、義大利、葡萄牙和其他國家也有團體對此感興趣。我們希望擴大網絡，可能的話，擴展到每個洲。我們計劃將經驗性的個案研究結合，以布爾迪厄的《世界的苦難》的思路進行分析，不過我們對於尋找有助剋服世界苦難的方法也很感興趣。此外，創新的集體財產形式、階級鬥爭、生態與社會之間的衝突及相互作用，也是我們試圖關注的。我們希望能邀請所有對這些主題有興趣的人合作。

GDE：作為全球對話的編輯，在將雜誌的展望推廣至全球的計畫上，你們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BA：雖然我們核心編輯團隊的跨國連結非常緊密，但僅憑這一點，還不足以涵蓋這麼多國家的社會學。我認為至少有三個挑戰。首先，學科內部的霸權主義、階級制度和權力關係，使得全球北方和西方的社會學，在傳播、受到肯認和散播影響上享有特權。如果有區域編輯團隊，或是團隊外部的年輕學者申請組織一個專題，例如「社會學對話」，他們往往會認為在自己國家的社會學裡頭，有一些重要的社會學成果從未進入國際視野。其次，ISA主席以及執行委員會作為編輯顧問的大力支持，讓介紹全球社會學成為可能。舉例來說，Margaret Abraham 和 Sari Hanafi 走訪各地，邀請不同國家的同仁一同貢獻，又例如執行委員會的同事，組織了不同國家的專題。第三，是我們知識生產的一個缺口，而且是最難處理的缺口：從全球北方／西方視角撰寫的全球南方／東方的發展研究很多，反之卻較少。如何將由後者視角出發的作品納入是一個挑戰。

KD：在我看來，一個核心問題是德語區和(西)歐洲社會學在不同程度上仍殘留的狹隘心態。我們太常將視野侷限在自己原有的概念裡面，且在長期受到資本主義侵蝕的西歐社會中進行研究。對我來說，要從這種狹隘掙脫出來並不容易。在全球對話和拉丁美洲社會科學理事會網絡的合作中，這一點逐漸在我眼中變得清晰。所以說經常聽到有人批判我們是歐洲中心主義，這樣的指責也是有道理的。這些情況確實阻礙了全球社會學的交流。然而，在全球範圍內，有些歐洲的社會學觀點也是有其正當性的。舉例來說，當我建議在全球對話中設立烏克蘭戰爭專題時，有些人拒絕或抱持質疑。這些質疑顯然是被誤導了：「雖然烏克蘭戰爭的傷亡不少，但同時世界各地發生的另外二十多場戰爭卻沒有得到相同程度的關注」，這種說法當然合理，但在分析上是錯誤的。烏克蘭戰爭是一場涉及世界新秩序的戰爭，其中包括握有核武器的大國之間對決所潛藏的危險。這場戰爭的後果，是一場全球性的戰爭，這使得我們有必要重

>>

拾湯普森的「滅絕主義」，並為其注入新的內容。滅絕主義指的是經濟、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機制作為特定方向的推力，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量人口滅絕。用 John Bellamy Foster 的話來說就是，烏克蘭戰爭催化了「雙重滅絕主義」。即使能避免核戰爭，加速軍備武裝與剝削主義的生產模式，也還是會極大化生態滅絕的風險。

GDE：最後一個問題：對你們來說，在思考未來該如何行動時，公共社會學中的哪一個觀點是最值得重視的？這題就換個順序，讓 Klaus 先回答吧。

KD：雙重滅絕主義也與社會學這個學科和全球對話有關——我們必須自問，我們可以用社會學的手段、方法做些什麼，來使這世界迫切需要的事物——一場社會／生態的永續發展革命得以發生。我們必須終止自新石器時代革命以來一直存在的，與非人類自然和其他生物的工具關系。只有身在比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平等、民主的世界中，此情景才可能實現。如果這樣的追求失敗了，就會出現更多打著「拯救自己！」口號的專制主義出現。相較於我們面對經濟生態危機所提出的漸進式方案，這種新的威權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是更可能發生的。我們必須更有力地將轉型議題推廣至全球社會學的中心。自羅馬俱樂部發布第一份報告時我們就已經知道，由於全球暖化和資源開發，世界正走向「深淵」。為何在知道這些的情況下，50年後的我們，仍然在為同樣的問題而努力，甚至，真正持續發展的，卻是無法永續發展的那些項目？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狀況？我們需要什麼類型的社會，才能為永續革命提供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意識到：就如已經被遺忘，卻難掩其重要的德國社會學家 Karl Hermann Tjaden 所言，永續是暴力的對立面。暴力在戰爭、性別、種族關係，或是基於階級的剝削中體現。

對於永續革命的追求，也提醒著社會學家——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我們不僅需要走出象牙塔，如 Michael Burawoy 多年前建議的那樣，我們還應該思考如何重新定位公共社會學。Karl von Holdt 並未順從學科安於現狀的主流，卻在他的新書中提出「批判性參與」，作為公共社會學的解放變體。這種值得全世界討論的有效方法，已經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因為對他們來說，可以是「右派」的公共社會學定義，實在太過不明確。在職涯遭受各種限制的情況下，這些學生還能兼弟弟如此認為，對我而言就像是看見了希望。

BA：我想提的有兩個面向。首先，就我而言，社會學和藝術之間的合作有很大潛力。藝術研究的新分支，以及藝術家對社會當代／未來發展辯論的貢獻是很明顯的。我們的編輯團隊已經和藝術家展開合作，例如請他們提供圖文、照片、圖像和藝術研究。除此之外還有更多方式，也可以透過在地方／全球層面將社會學與藝術結合，為接觸學術／非學術受眾開闢途徑。其次，全球對話能匯集全球不同研究領域對當代社會發展的分析來促進討論。不僅於此，同樣需要採取或推動的，是建立跨國的研究網絡，為不同社會學與國家的觀點創造空間，同時藉著網絡的建立，以尋求社會對發展的共識、解決這個時代最迫切的問題。就我的理解，公共社會學必須成為這類研究議程和網絡中重要的一員——其牽涉到資訊傳播策略的發展，以及各領域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合作。■

來信寄至：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Klaus Dörre
<klaus.doerre@uni-jena.de>

> 歡迎參加於墨爾本舉辦的第二十屆 ISA 社會學世界大會

Sari Hanafi，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黎巴嫩，ISA 主席（2018-23）

我們終於要見面。當最終為第二十屆 ISA 社會學世界大會定下日期，還有許多問題沒解決：應該以線上、綜合還是現場的方式舉行？誰可能沒辦法參加？誰可能對與他人靠得太近感到害怕？在因疫情導致的幾乎有三年之久的線上會議以後，這場將舉行的現場活動看起來像個歷史性的時刻。

我們設想了不同的情況，但就目前收到了7126篇摘要來看，結果是令人感到鼓舞的。在這些摘要中，有三分之二的是準備在現場進行報告的，另外三分之一則採線上方式。節目協調員已經對提交的資料進行很好的評估，並從124個國家中錄取了6408份摘要。與上一屆（2018）在多倫多舉辦的世界大會相比，摘要的錄取率上升了百分之十九。我們於此邀請所有被錄取者在報告者註冊的截止日期即2023年3月22日以前完成註冊。

本次大會的節目是節目委員會多次開會的主題，節目委員會的組成如下：四位副主席（Filomin Gutierrez、Eloísa Martín、Geoffrey Pleyers 以及 Sawako Shirahase）、地方組織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 Dan Woodman、四位研究協調委員會成員（Hiroshi Ishida、Allison Loconto、Susan McDaniel 以及 Nazanin Shahrokni）、四位國家協會聯絡委員會成員（Elina Oinas、Bandana Purkayastha、Celi Scalon 以及 Borut Rončević）、特邀客座人物 Armando Salvatore 以及我本人。由 Dan Woodman 主導的地方組織委員會承擔了巨大的後勤工作。我想要為他們的偉大工作向他們表示感謝。我們已經制定了精彩的節目，大部分講員都將親臨現場。容我再分享一些亮點。

當我們把這次 ISA 世界大會的主題定為「復甦的極權主義：宗教、政治與經濟的新糾纏社會學」（Resurgent Authoritarianism: Sociology of New Entanglements of Religions, Politics, and Economies），極權主義還沒如現在那樣普及，包括在全球北方。特別是當國家保守主義計劃取代了自由主義政治計劃以及公共理由變得既不能處理正義的統一概念也不能處理社會中不同的善的概念之時，透過極端民族主義並宗教狂熱的結合，公共文化逐漸的「符號增厚」促進了極權主義的增長。隨著社會的等級分化愈發嚴重，我們生活在一個理性的公共辯論變得少有可能的時代。這是個被高漲的民粹主義以及存在於我們的學術和媒體之間、宗教和世俗之間以及它們與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關係中的諸種誤解所驅動的煽動性的時代。宗教信仰在大部分地區增加了，而世俗主義在某些國家裡也成為了一種公民宗教，為了對抗其它宗教，特別移民所帶來的外來人口的宗教。

> 主席小組與全體會議

在這理論框架中，我們構設了一項包含有兩個旨在將社會學連結到道德與政治哲學上去主席小組的計劃。

第一個小組的主題為「自由主義、他者和宗教」，由兩位哲學家和兩位社會學家來辯論這個主題。法國哲學家 Cécile Laborde 為最小限度的世俗主義辯護，而巴勒斯坦哲學家 Azmi Bishara 則將論證，如過整全性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如公民自由和個人自治，在主流文化的背景下能夠重現，那麼就是可促進的。對於巴西–比利時社會學家 Frédéric Vandenberghe 來說，對社會不平等及社會病態的社會學批判是緊貼著「自由社群主義」的劇目的：它有時傾向身份及誠實性的社群一極，有時則傾向於自主與正義的自由一極。最後，對非洲社會學家 Anna Halafoff 來說，宗教的角色在於促成及抵制宗教民族主義興起時表現出來的反世界恐怖。

第二個小組是關於「建立一個公正的後疫情世界」。新冠疫情的超現實氛圍曝露了人類、國家、公民與政府之間信任的斷裂。它迫使我們提出關於自身、我們的社會關係以及普遍意義上的生活的重大問題。這一危機時刻可能成為積極應對這一新現實及其伴隨而來的猛烈的不確定性的機會。雖然

>>

這一全球危機可能激起加強剝削、剝奪以及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新策略並且增擴了我們的貪婪和自私的範圍，但它也允許我們去探索及為理解和重新獲得我們的人性和社會正義提供新的方法。Didier Fassin 將指出沒有在疫情中學習到的教訓，主要專注在公共衛生和社會不平等問題。對他來說，健康危機揭示了大多數國家公共衛生的缺陷以及國家內或國家之間社會不平等的深度。Eva Illouz 則對作為後疫情時代所揭示的反民主情緒的恐懼感興趣。同時，Afe Adogame 以其加納人的敏感性，闡明了以無數方式上演的諸宗教、科學與疫情之間的關係。當科學挑戰宗教在提供保護、醫治、安全以及希望的合法性及效力時，宗教也反過來對抗科學作為萬能藥的功效和權威。最後，面臨著新冠疫情的衝擊，Li Peilin 則認為現代世界系統理論、冷戰理論以及文明衝突理論都無法理解區域性的衝突以及世界經濟衰退的威脅。他於是呼籲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後西方社會學，為建立世界和平秩序貢獻。

這些小組外，還會有八場全體會議分別處理四個不同主題：後世俗性（post-secularity）或多重世俗性（multiple secularities）視角下的世俗主義；極權主義，特別是其殘暴版本及對知識和後實況性（post-factuality）的影響；民粹主義及其全球現象的不同形式，以及一個邀請——邀請人們以一種交織的取徑來理解「人」之概念的建構；以及新自由主義，它導致了如此多的不平等，並危害了個人和集體的生命權。

> 焦點會議

由於我們的目標是本屆大會不僅僅是跨學科的談話，而且要與媒體、公民社會的行動者和政策制定者交流，由此我們設想了三場焦點會議，專注在討論三個緊迫的趨勢和衝突。

第一場會議是關於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症。雖然在民權時代之後，公開的種族主義被廣泛地譴責，但我們如何概念化及測量其更微妙和擴散的當代表現？這場會議將特別專注在伊斯蘭恐懼症的興起。Nacira Guénif 會論證，與其把整合當作種族主義以及更何況是伊斯蘭恐懼症的解方，不過看看，在法國和其它地方，整合的修辭如何促進了種族主義實踐與論述，同時容許了輕視的政策並為一種持久的伊斯蘭恐懼症開闢道路。而對於 François Burgat 來說，歐洲與穆斯林世界的張力和斷裂，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區域的，都可以分析為諸種歷史動態的結果。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這些斷裂基本與全球性的宗教事態沒什麼干係，反而是與內部的以及政治事務有關。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和運動家，Randa Abdel-Fattah 會指出，澳大利亞的邊緣化社區是如何被屈服於關於「溫和的/政治的/整合的」穆斯林的常識性觀念和腳本的持久和誘人的力量的穆斯林「領導階層」背叛的。最後，Farid Hafez 會著重在穆斯林社會中的伊斯蘭恐懼症，把它視作控管與規訓穆斯林的一種方式，從而將其框定為是政治的。在許多穆斯林國家（比如在西亞的一些國家），國家機構正在推動法律以歧視那些在政治上反對當權者的穆斯林。Hafez 以這種方式超越了多數–少數的關係動態。

第二場焦點會議將針對烏克蘭戰爭提供一個社會學的視角。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犯震驚了世界。這不是一場孤立的戰爭；它是例外的因為它有可能逐步擴大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且可能是核武戰爭。撇開地緣政治不談，Nikolai Genov、Olga Kutsenko、Larissa Titarenko 以及 Tamara Martsenyuk 等四位小組成員，將探討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社會變革，這些變革使導致戰爭的社會條件得以發展。他們也將思考這場戰爭對兩個社會的未

>>

來變革可能帶來的影響。這場戰爭還對歐洲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並帶出不同的問題如歐洲觀念的發展、難民危機的影響、糧食和能源匱乏對全球社會的衝擊、批判性地評估戰爭的學術自由等。

最後一項焦點會議是關於阿拉伯–以色列衝突。一些人將這一衝突解讀為延續自1948年的移居者–移民計劃並且針對巴勒斯坦人建立了種族隔離制度，而另一些人則解讀為阿拉伯與以色列猶太之間的民族主義衝突。無論這個衝突如何被解讀，一個緩慢地發生在巴勒斯坦領土的「空間消滅」進程在任各個層面上都是相當明顯的。和平進程（即所謂的奧斯陸進程）沒有加以阻止。許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學者爭論說兩國方案已隨著奧斯陸進程的失敗而崩潰了，從而我們應該致力於為所有公民建立一個世俗國家。四位小組成員將反思這一主題：巴勒斯坦社會學家 Mohammed Bamyeh 和 Areej Sabbagh-Khoury，以及以色列社會學家Ian Lustick 和 Lev Grinberg。

> 前主席小組及 ISA 的歷史

2023年6月於墨爾本，我們將慶祝第二十屆的 ISA 社會學世界大會。為了凸顯這個重要的週年紀念，我將我的主席計劃著重於發布過往所有大會的摘要並更新 Jennifer Platt 傑出的作品《ISA 1948-1997歷史》上。有兩項研究被託付出去了。一項是由 Gisèle Sapiro 實行的，檢視了過去大會選定的研究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和計劃，並分析了它們在主題、理論和方法上不斷變化的形式和內容。Tom Dwyer 實行了另一項研究以更新自1997年至今的《ISA 的歷史》。前 ISA 主席 Margaret Archer、T.K. Oommen、Alberto Martinelli、Piotr Sztompka、Michael Burawoy 和 Margaret Abraham 也將對這兩項研究進行評論。

> 當作者遇見批判家

我們已為這些會議選定了六本由不同地理區域的社會學家所著或編輯的精彩好書，伴隨著令人興奮及適時的主題：

·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Public Sociology: A Perspective from the Global South* edited by Andries Bezuidenhout, Sonwabile Mnwana, Karl von Holdt

· *The Gift Paradigm: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Anti-Utilitarian Move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y Alain Caillé

· *Aesthetic–Cultural Cosmopolitanism and French Youth: The Taste of the World* by Vincenzo Cicchelli and Sylvie Octobre

·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Progress and Stagn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y Shamiran Mako and Valentine M. Moghadam

· *Diaspora as Translation and Decolonisation* by Ipek Demir

· *Refuge beyond Reach: How Rich Democracies Repel Asylum Seekers* by David Scott FitzGerald

> 還有更多

研究委員會對本次大會的主題有自己的理解並以不同的取徑選擇了論文。此外，我們還有由澳大利亞當地組織委員會所組織的四場精彩的澳大利亞專題會議，是關於如下引人注目的主題：難民、氣候變遷、土著獎學金以及澳大利亞的當代不平等課題。當然，在該計劃中還有綜合會議以及不同國家、區域、語言和專題協會的會議，並臨時會議和專業發展會議。在大會之前，我們還由不同的研究委員會以及澳大利亞社會學協會（我們當地的主辦方）組織了一些會前活動。我在此要特別強調為 ISA 全球青年社會學家競賽的獲勝者和決賽入圍者所舉辦的研討會，這將會帶來來自14個國家的15名青年社會學家。

不必多說，墨爾本是個見面的好地方：它是個充滿活力和友善的城市，擁有公共藝術、許多公園和美味食物並有一些經濟適用房。我盼望在2023年的六月底見到你們！■

來信寄至：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Twitter: @hanafi1962

> 後疫情時代：重燃對於實體會議的信心

Anahí Viladrich，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美國

來源：Unsplash。

2022年8月，我飛往洛杉磯參加第117屆美國社會學年會。此次開會，是我兩年以來第一次親身參與的會議。雖然我非常興奮能與同事們重聚，但心中仍然害怕與其他人有過於近距離的接觸。對於這場連續四天，且參與者有4500多人的實體會議，我非常擔憂自己可能再次染上疫情。即使我已接種疫苗，甚至曾感染過兩次疫情，但對於是否要與數千名同事共處一室的這個決定，我仍猶豫了非常久——即便我知道多數人都會戴著口罩參與會議。

在權衡各項選擇之際，我反思了線上會議和實體開會的利弊，並決定從事社會科學家似乎最擅長的工作，也就是研究他們兩者各自的優勢與劣勢。在這篇文章中，我回顧了我的所學，以及我如何在後疫情時代，將面對面會議經驗更加優化的分享。

> 循環繞圈

疫情剛爆發時，Zoom 的使用，被認為是使我們在知識與網路獲取方面會更加大眾、普遍化的機會。而接下來兩年半的期間，線上會議被證明是最便宜也最容易的開會方式——無論是在自己的居家辦公室，甚至是臥室；我們都能讓學術和職業團體共聚。這種網路發展，讓我們可以從任何地方參與異地的活動，也就表示我們留下較少的碳足跡，從而有助緩解氣候變遷。在疫情前，我們必須花上大量時間參加這些舉辦在遙遠地點的會議。而且在開會前，為了確保註冊、機票和食宿的費用無誤，我們總免不了耗費許多時間與大學行政部門進行交涉。

2020年3月，大家開始頻繁使用線上會議後，原先那些繁瑣的事前準備幾乎都消失了。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長期面對螢幕的我們，變得越來越疲憊。更不用說，在開會時那些時不時可能出現的令人尷尬的瞬間，更令人心力交瘁（如：設備技術問題、麥克風故障，還有最常見的問題，也就是巨大的廁所沖水聲與孩子們的哭鬧聲）。另外，充分利用線上會議，也表示我們將可能花較少的時間參加同事的演講和分組會議。老實說，許多機構希望他們的教職員在參加線上會議的同時，也能繼續完成他們的日常工作。

>>

最初，我對參與今年的ASA會議感到猶豫不決。對於參加一個潛在的超級傳播者可能出現的活動，我真的感到非常恐懼；這樣的懼怕，甚至抹滅了原先我對於面對面學術交流的強烈慾望。不過，幸好許多建議和文獻都幫助了我減緩憂慮，以下是我整理出的建議，以及針對此事的總結。

1.疫情的安全指導方針與了解會議進行的預期情況：就如目前多數專業組織舉辦的現場活動，ASA將每個人的安全擺在第一順位，疫情的協議內容也會貫徹整場會議。會議的組織者和與會者之間的會前溝通，不僅闡明整場會議維持安全的策略，也是幫助演講者調整他們對會議期望的關鍵。到會場前，我們需事前上傳我們的疫苗接種卡；而在抵達會場時，現場工作人員也會協助檢查每個人的疫苗接種卡，確保人人都已接種過疫苗。也就是整場會議表明了：沒有接種過疫苗或沒有配戴口罩者，無法進入會場。

2.保護他人的責任感和榮譽準則：雖然無法完全排除可能感染和傳播病毒的風險，但我們透過宣導保護彼此的觀念，試圖減少人們暴露在染疫高風險情況的機會。因此，即使是在發表論文時，我們仍需與他人保持安全距離，且在室內須全程配戴口罩（除了吃飯或喝水，才能暫時脫下口罩）。感謝洛杉磯美麗的夏季天候，許多活動都在戶外舉行，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空間進行交流。

3.場域的升級：這次會議的進行過程，許多人都經歷了一種共同的「怪異感」——雖然感激有機會能與他人接觸，但在衡量與其他同事的安全距離時，許多人都對此產生不確定性與疑慮。因為，自己如何防疫和每個人希望與他人保持的安全距離有多少這件事，都會因人而異；因此，也會令人特別難以拿捏與他人的身體距離。更重要的是，許多人因為久未當面與他人社交，因此在閒聊時，可以看出他們對於這件事已經略顯生疏。在ASA會議期間，一些年輕和資歷較淺的同事告訴我，「破冰」這件事，對他們來說並非如此輕鬆容易。就像其他技能一樣，擅長與習慣社交是必須練習的。這對於那些因疫情而失去親人，或持續患病而受到創傷的人來說尤其重要。因為對他們來說，室內空間可能已成為一個病毒的遊樂場。

幸運地，會議名牌只包括與會者的名字和姓氏，並沒有透露關於個人工作機構或專業領域的其他資料。此措施有助於避免對身份、級別和大學隸屬關係的成見，從而促進與會者之間的自發交流。此外，大多數人都經歷了一種隔靴搔癢的痛苦，也就是我們想與同齡的人互動、分享趣聞，閒聊各自如何在這場疫情中調適身心靈。但，原本現實生活中習以為常地交談和相互握手的互動方式，在這場疫情後皆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最終，這些各種各樣的疫情故事，成為了一種特殊、能串連起我們彼此的共同點。

4.重新現身於現實生活：任何虛擬平台都無法真正取代現實生活中與他人的關係，也就是在社會學術語中，我們所說的「社會資本」。現場會議的「閒聊」，可已被比擬為一種迅速的約會關係：比方說，你在排隊喝咖啡時碰到了系主任、編輯或資歷年輕的同事，那有可能這一次的閒聊，就成為你獲得新工作或書籍合約的入場卷。或者，你也可能會與某人擦出火花，因此找到你生命中的愛人。更別說聆聽同事的演講，可以使你更了解相關的計畫。這些都可能激發你新的想法或提高你的學術水平；並使你在使用茶點的休息時間或會議進行時，擁有更豐富學術交流。

> 未來之路

我差點與今年 ASA 的實體會議擦身而過。現在回想起來，我很高興自己沒有放棄這次能實際現身會議的機會。對我而言，參與會議的意義遠大於單純的學術交流；雖然這是老生常談的一句話，但在此時，我更能深刻地體會到此事。然而，儘管面對面的活動對專業組織的生存是至關重要，但它們仍然反映了在疫情之前就普遍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其中包括我所說的「五星級飯店的會議模式」，這種模式有利於那些擁有機構資源（也就是：有錢）的人；不利於條件較差的大學、少數民族和研究生。幸運的是，許多專業組織，包括 ASA，都事先呼籲希望使所有人都能參加現場活動，包括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參與者。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都將是未知。不管疫情的情況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串流媒體與（同步和非同步的）線上活動，都將延續於我們的生活中。同時，我也已經迫不及待地想參與下一次的現場活動。「此時此地」，希望我能鼓勵各位成為一位更好的自己：既致力於學術，又富有同理心。■

來信寄至：
Anahí Viladrich
<Anahi.Viladrich@qc.cuny.edu>
Twitter: @prof_anahi

> 全球社會學作為一種嶄新的全球對話

Geoffrey Pleyers，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比利時，國際社會學協會研究副主席（2018-23）

相片拼貼：Arbu，2023。

在1990年代社會學的全盛期後，全球社會學受到了各種研究方法的嚴厲批評，包括底層、後殖民、解殖、女性主義和性別研究、南方理論以及其他「南方認識論」的研究。除了議題上的異質性外，其研究方法一致聚焦於挑戰全球社會學的正當性；因為全球社會學被認為受歐洲中心主義和北方／西方社會學家的論述所支配。

上述批判理論所提出的認識論議程結合了兩個步驟。首先，我們需解構固有的歐洲中心主義，正如 Sujata Patel 所論述的，全球社會學和我們學科的多數認知框架都紮根於此。而這樣的觀點，等同對西方主導的知識生產和傳播，以及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觀都提出了挑戰。Enrique Dussel 表明，殖民主義和對美洲大陸的佔領，並非現代性的一個附帶問題，而是一個核心且基本的問題。因為現代性即是仰賴殖民主義而建立，並且它更以此不斷重複再製這樣的模式。西方的主體性是在對「他者」的支配關係中構建了自己。因此，當代社會科學的一項基本任務，即是要分析建立、維持、重現和更新這些社會行動者、機制和機構的社會形式，以及也須認知到是原有的知識體系是如何受西方主導的論述所支配。這就包括了，在再製社會結構和認識論體系中，對於他們自己過去和現在角色的反思性分析。

第二步，關注那些在現代化進程中被「隱形化」和否定的世界觀、經驗與知識，並使他們可見。原住民、生態、女權、農民和少數族群的運動，都已將此作為解放性抗爭的重要部分；這也是在針對全球北方和南方研究的社會學家們，需迫切執行的其中一項任務。對於專業社會學者來說，此進程最重要的部分包括：看見長期以來被忽視的研究者、行動者、作者和學者，正視他們對此學科的貢獻。

> 社會和認知抗爭

這種批判性觀點是源自於社會學學術場域的邊緣。在拉丁美洲「解殖主義觀點」的興起，就是一個最明顯可見的例子：它說明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辯論是源自社會運動，特別是原住民的抗爭運動，而這樣的思想隨後才逐漸滲透到學術界。過去的三十年，來自全球南方和來自「受壓迫階層」（特別是女性主義者和

>>

少數族群)的批判者、社會運動和學者,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現代性、公平和「進步」的方式。全球南方的小農、原住民和社會運動者發展的觀點,如生態女性主義和「美好生活」(如:來自厄瓜多爾的 Sumak Kawsay)等觀點,皆深深影響我們看待生態、(我們所屬的)自然和自身的方式。並且,類似的觀點進程也發生在全球北方。「交織性」的概念即源於女性主義和黑人運動的抗爭中;此論述是透過 Crenshaw 的書寫被看見的。重要的是 Crenshaw 並非社會學者,他以社會運動參與者和律師的身分來說明和闡述這觀點。由此可見,如今我們許多關鍵概念都源於底層的社會運動。

放下原本全球北方對於事物的認識論,以開放的心態向全球南方立場學習,如此一來,我們會看見社會行為者是如何作為知識的生產者,包括他們的如何去實踐知識的理論視角、觀點,他們的認識論和世界觀(「宇宙觀」)等,這些都將更清晰可見。事實上,原住民、農民或女權運動,皆一致認同替非傳統的世界觀進行抗爭,是實踐社會正義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厄瓜多爾原住民組織的領導人 Luis Macas 曾說:「我們的抗正是政治性和認知性的」。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斷言「沒有實踐認識論的正義,就不會有社會正義」,他認為應將這些抗爭的討論移至學術領域,並為「認知霸權」而努力抗爭。

學者之間對於認識論爭論的藩籬已被打破。這些「社會和認識論的抗爭」不僅是我們的研究對象,而且滲透了整個學科。認識論和社會學是解放計畫戰場的一部分,因此也部分被它們改變了。

> 全球社會學仍有其正當性嗎?

在這波強烈的批評後,全球社會學是否仍具有其正當性?或者說「全球社會學」是否與歐洲中心主義(殖民主義、父權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世界觀有其內在的關聯性?社會學是否應該放棄這個論述,以公正地對待植根於地方經驗、抗爭和特定文化的知識?我們是否應該專注於重建社會學的地域性和國家的歷史,以正視那些長期被忽視的國家和地區作者、學者的貢獻?

「解殖主義的轉向」使西方社會學者放棄快速將研究成果、概念和解放視野普遍化的習慣。它要求我們承認植根於歐洲中心主義社會學中具支配性的認識論,並承認來自世界不同地區和受壓迫背景的學者和社會運動者,對學科的歷史和相關的重大理論貢獻。甚至,它要求我們修改學科的典籍,更新「全球社會學」的觀點;因為,長久以來「全球社會學」的觀點,就只是西方社會學的觀點罷了(實際上只是西方社會學討論中的一部分)。然而,解殖主義的轉向並沒有使全球社會學被全盤屏棄。墨西哥原住民的Zapatista社會運動表明:可以容納更多不同世界觀的世界,並不意味著需放棄任何全球視角。

在解殖主義轉向後(並透過這種轉向)重建的全球社會學,若要清楚地了解對於歐洲中心主義的批評以及看見非傳統的知識,就必須輔以第三個不可或缺的步驟:跨文化對話。「跨文化對話」要求研究者看見自己的立場,並願意向他人學習。這種姿態既是社會學的、文化的,也是個人的。它應該植根於一種願意承擔風險的意願,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確定性(和希望),並從與他人的接觸中重新學習對於世界的認知。在這些前提下,社會學也就成為了一個集體項目;社會學聚集研究者的反身性,共同尋求對這個世界以及行動者更好的理解。

若是沒有這種開放的、跨文化的全球對話,批判立場和理論的更新就會有三種風險:第一、分裂,第二、孤立(對於在邊陲的社會運動者和批判學者的溝通、接觸困難),第三、將西方社會科學和其知識的支配性,和南方社會科學和其知識的解放性兩者同質化。為了更新全球社會學並恢復其適當性,我們需要將歐洲的根源和貢獻「地方化」。正如 Chakrabarty 所解釋的,這並不表示全盤屏棄西方對社會學和批判理論的貢獻,而是將其視為更全面化的全球社會學的一部分,且此社會學領域是根基在建立地方性的概念和建構之上。

在 Achille Mbembe 的代表作〈Critique of Black Reason〉中發表了基進且非常具說服性的批評。在書中,他分析現代性以及當代現象中的殖民性,且在該書的後記中註記「我們只有一個世界」。他堅持世界各地的人們皆是相互聯繫的,我們需要發展一種新的世界性視角:「我們是共享這個世界的,而且這個事實無法被否認,[……]對差異的宣揚只是另一更大的願景中的一小部分——我們正朝向對於這樣一個世界的願景,也就是一個擺脫了種族、怨恨的負擔,以及拋開那些被種族主義的所召喚的報復慾望。我們所期待的就是這樣的一種世界。」解殖民的歷史旨在重建一個共同的歷史,而不僅僅是被殖民的人民的歷史。同樣,我們的目標是重構一個共同的社會學,與來自全球南方、被邊緣化立場的社會學者和社會運動者一起。這不僅僅是為了他們,更是為我們所有人。

因此,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巨大挑戰,即是逐步形成一種行星思維。如果社會學能完成此任務,就能為這個觀點做出貢獻。要完成這點,全球社會學既不

>>

能繼續紮根於西方大學和其典籍；因為這些典籍將自身的觀點視為說普世的價值，另外，我們也不能局限於對西方社會學的批判。它需要像 Gurminder Bhambra 提議的，聯繫各種不同的社會學觀點，並從此重構一種共同的社會學，這種社會學是多元化的，但仍建立在透過全球對話所產生的共同基礎上。

> 國際社會學協會作為更新全球社會學的工具

ISA近幾十年來的主要任務之一，即是透過更好的研究方法將研究、認識論以及來自全球南部和擁有受壓迫背景的學者充分納入普世的社會學，並以此建立與更新全球社會學的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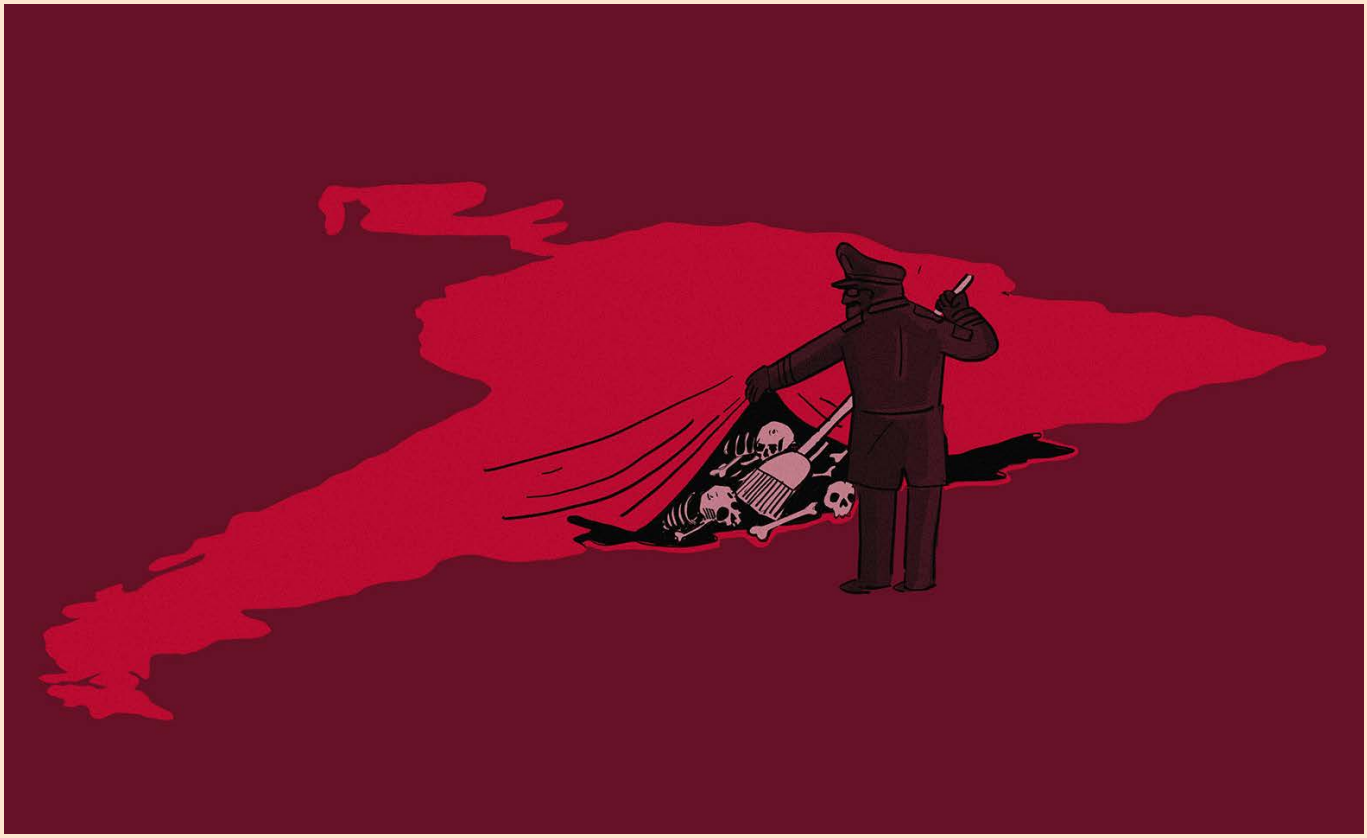
國際社會學協會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上：借 Sari Hanafi 和 Chin-Chun Yi 的話說，他們認為來自不同地區的社會學家之間的公開對話是「解決全球重大社會學問題的關鍵」。Sari Hanafi 和 Chin-Chun Yi 將國際社會學協會第四次國家協會會議的貢獻收集在《Sociologies in Dialogue》一書中。ISA研究委員會成立了一個任務小組，目的是為共享好的實踐方法，並提出具體建議，促進ISA及其研究委員會內部的公平、多樣性和包容性。向來自全球南方的作者提供更開放的環境，一直是ISA期刊和協會書籍的共同使命。宣傳不同地區的社會學觀點，並促進其交織、對話，是ISA雜誌全球對話存在的理由。ISA的社交媒體有助於分享來自不同地區的資訊、分析結果和觀點。然而，即使我們存在於線上開會非常普遍的時代，但人與人面對面的接觸，仍然是促進彼此關係的最佳環境，也可以為加深對於彼此立場、爭論和文化差異的理解。這就是為何全球性的會議和社會學論壇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活動；也是為何研究委員會同時使用線上會議以及實體會議的原因。我們的挑戰，仍然希望替學者們是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和多樣性的討論空間，以此促進對於全球社會學的更新。為此，我們需要使全球社會學和進入國際舞台的對話機會普遍、民主化，同時也須保持植根於人們面對面交流，這種社會連帶的重要性。

承認、「使其可見」和學習來自全球南部和受邊陲化背景的研究者和行動者的社會學，不僅是透過滿足多樣性標準和確保知識傳播的公平性，來使社會學更加民主。這也是對於擁有更豐富的資訊，以及更具適當性的社會學的探索，以此，可以為社會面臨的挑戰，提供更複雜和多方面的分析。巴西教育家 Paolo Freire 表示，被壓迫者的觀點和分析，可以提供對於他們現實和社會更好的理解。在疫情間，女性主義學者和社會運動者的貢獻，表明他們有能力改善對我們的世界的認知，他們提出的那些具挑戰性的觀點遠遠超出女性主義和性別平等的範疇。來自全球南部的社會學者的分析和理論貢獻，也同樣有助於我們理解該地區的現實和挑戰；以及身在全球北方的生活和社會之中，如何達成更具「普遍性」的理解。南方的認識論與女權主義、生態學、原住民和具交織性的研究方法，不僅僅是21世紀社會學的另類選擇，更是全球社會學的核心；因為這些論述已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學科。■

來信寄至：
Geoffrey Pleyers
<Geoffrey.Pleyers@uclouvain.be>
Twitter: @GeoffreyPleyers

> 為什麼我們需要新的架構研究全球南方的極右派

Rosana Pinheiro-Machado，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愛爾蘭；**Tatiana Vargas-Maia**，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巴西



巴西藝術家和政治學家 Ribs（https://twitter.com/o_ribs 和 https://www.instagram.com/o.ribs/）為社會理論和拉丁美洲研究核心的社會運動觀察站（NETSAL-IESP/UERJ）所作的插圖。
來源：Ribs，2021。

大量的研究試圖解釋2010年後極右派的興起與復甦。本篇短文中，我們將透過以殖民主義為分析核心（Masood 和 Nisar，2020；Tavares Furtado 和 Eklundh，2022）的全球南方視角[1]論證此現象。國際文獻經常將全球南方視作更廣泛的政治活動範例、個案或變體進行以歐美國家為核心的分析。這般殖民化的學術思維，讓巴西和菲律賓等國家都經歷並重塑世界上最激進和暴力的獨裁主義。Jair Bolsonaro 執政時期對環境造成難以估計的迫害，卻只引起少數國際學術單位和記者注意，因此阻礙了人們了解極端份子對世界造成的嚴峻傷害。

回應近期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研究中，並沒有明確指出南北方國家的區別，皆主要分析歐美國家的政黨與政治行動（如：Brown、Gordon 和 Pensky，2018；Eatwell 和 Goodwin，2018；Hawley，2017；Hermansson、Lawrence、Mulhall 和 Murdoch，2020；Inglehart 和 Norris，2016 以及 Mondon 和 Winter，2020；Mudde，2017；Mudde 2019；Mudde 和 Kaltwasser，2018）。這使研究結果有限但普遍一致，都將重點著重在解釋富裕國家的衰退、福利國家的潰堤、移民問題、勞工階級的貧窮與不滿、去民主化和針對自由民主的反抗。

>>

> 當代極右派的背景

我們必須先探究極右派(再次)出現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背景;在這方面,這將對一些新興經濟體的考察具有啟發性的作用。當 Narendra Modi(印度,2014年)、Rodrigo Duterte(菲律賓,2016年)和 Jair Bolsonaro(巴西,2018年)掌握權力後,他們的國家並沒有在過去任何形式的福利國家中崩潰:窮人擺脫貧窮和極權主義早已不再新奇;相反的,它蘊含著巨大的希望。這段期間,印度和菲律賓持續維持高度經濟發展;儘管在巴西選出 Bolsonaro 後出現經濟衰退,極右派的復甦仍隨著經濟成長的高峰到來(Rocha,2018年)。這些國家並不需要面對因為移民與當地居民搶工作所造成的難民危機;相反,他們正面對族群化的「內部敵人」。

在以持續的獨裁主義、保守主義、不穩定性高和殖民化為特徵的全球非核心地區,極右派再現的現象不應該使用以「歐洲—美國—西方國家」為脈絡的架構進行解釋。在一篇充滿洞見、關於反殖民主義的批判學術論述中,Masood 和 Nisar (2020)建議針對極右民粹主義的全面分析必須考慮到這些運動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異質性。但這並不代表我們認為全球北方的經驗應該被忽略,2008年的經濟大蕭條、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美國川普當選總統都是讓獨裁主義渲染全球,並提供這些行動背後動機和機會的重要事件。全球北方國家利用自己較高的權力,不斷灌輸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給全球南方。除此之外,社群軟體、全球化的經濟模式、跨國權力網絡和陰謀論也都是讓獨裁主義邁向全球的因素。

> 新極右派的學術研究:比較和全球議程

雖然關於全球南方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研究有著悠久的傳統,但有關新極右派的文獻卻遲遲沒有將巴西、印度等國家納入同一的分析現象中。2017年由Cas Mudde 編輯的《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 Reader》一書應是地區性的論述,因為它主要關注歐洲地區,卻被視作全球性的研究結果。Bolsonaro 執政帶來的影響吸引了全球的關注;然而,這一過程的認識論取徑似乎被學術界持續存在的殖民化知識生產所主導。現在巴西已被一些研究納入全球極右派中全球南方代表的案例,並且使用同樣的方式進行分析。我們同意 Masood 和 Nisar(2020)的看法,研究取徑應該被翻轉:全球目前興起的現象的部分因素正是從全球南方未完成或混合的現代性而來。

儘管有大量的文獻資料分析引起全球南方再次興起民粹主義的原因和社會現況,對於此現象的了解仍因為缺乏探討為什麼幾個新興國家會再次迎向威權政治的框架而顯得狹隘且零散。透過聚焦在南方的經驗,我們應該重新校準社會對於被殖民國家經驗的理解,並且拓展概念範圍和限制(而不是否認它們)。在一個嶄新的研究議程中,我們應該問:新極右派的「新」代表的是什麼?Bolsonaro 或 Duterte 所引導的威權民粹主義和過去的獨裁政權之間的異同為何?北方國家可以從長期以極端政治表現為標誌的國家中學到什麼教訓?這些新型態的極端主義、新法西斯主義和獨裁主義在不穩定的社會下與殘酷的新自由主義理性相互結合,並在二十一世紀透過新科技助長民粹主義,並使其成為主流。

或許南北方極右派最主要的差異是它的強度與規模;然而,正因為這般區別,才必須在歷史的特殊性中加以理解和歸納。例如,川普和 Bolsonaro 可能會在相同的社群媒體上發表大同小異且令人難以忍受的說詞,並同樣使用狗哨政治策略;然而,由其引發的仇恨態度會根據各國不同程度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民主性而出現徹底的不同。大多學者在分析各地民粹主義之間的相同之處時便已耗費大多的心力,但同樣需要關注的是,比起北方國家,南方國家更嚴重和危險的針對性別和性權利的討伐。

> 全球南方的特點

下列是說明全球南方部分特殊性的新架構,由五個面向組成:

1.經濟衰退和政治主體性:極右派的文獻著重在以貧窮、怨天尤人為形象的白人男性上;相比之下,全球南方的殖民國家總以戰爭多、經濟衰弱的樣貌呈現。然而,新興國家推動經濟復甦也同樣是促進新型政治參與的主體。回顧輝煌往日固然是了解北方國家的新法西斯主義主體性的基礎,但若要應用在南方國家,此一範疇需要被重新思考。

2.民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細微差距:民族主義在殖民國家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誠如上面所述,部分全球南方國家並沒有輝煌的過去可以頌揚,只有未來可以預見。比起外來者(移民或難民),這些國家更有可能出現內部敵人(少數族群)。即使種族主義是極右派研究的核心,但舉例來說英國的白人至上主義和印度教至上主義的意義便有所不同。

3.獨裁統治和鐵腕人物的遺毒:許多南方國家都在承受血腥獨裁政治後帶來的後過,造成政府和軍方面對少數種族時長期的暴力傾向,也使這些族群從來沒有經歷過各種民主形式。

>>

4.非世俗民主中的宗教性和道德保守主義：現世主義是建立民主的核心要旨，然而全球南方在建立新民主時正面臨宗教對政治事務的干擾和原教旨主義的負面影響，後者作為一種紀律模式，控制著身體和性。

5.反抗：極右派再次出現在全球南方，並且持續進行著。然而，其中幾個對抗極右派的重要應對方式和富有創意的回覆來自拉丁美洲國家的女性社會運動，像是阿根廷和智利。

最後，這五個面向並不一定佔決定性的因素，也不適用於所有情況。這些建議可能揭示了全球南方國家日常威權主義展現的共同特徵。為了更近一步了解極右派在全球南方出現的起因和造成的後果，我們相信需要進行更多的比較研究。這方面的鑽研有可能改變我們對當代世界的政治現象的理解。■

來信寄至：
Rosana Pinheiro-Machado
<rosana.pinheiro-machado@ucd.ie>
Twitter: @_pinheira
Tatiana Vargas-Maia
<vargas.maia@ufrgs.br>
Twitter: @estocastica

註1.詳見 Pinheiro-Machado 和 Vargas-Maia 2018年的文章，它也是我們出版於2023年的書籍的改寫版本。

參考資料：

Brown, W., Gordon, P. E., and Pensky, M. (2018) *Authoritarianism: three inquiries in critic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atwell, R., and Goodwin, M. (2018) *National populism: The revolt against liberal democracy*. Penguin UK.

Hawley, G. (2017) *Making sense of the alt-ri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ermansson, P., Lawrence, D., Mulhall, J., and Murdoch, S. (2020) *The International Alt-right: Fasc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Inglehart, R. F., and Norris, P. (2016)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arvard JFK School of Government Faculty Working Papers Series*. 1-52.

Masood, A., and Nisar, M. A. (2020) Speaking out: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the academic discourse on far-right populism. *Organization*. 27(1), 162-173.

Mondon, A., and Winter, A. (2020) *Reactionary democracy: How racism and the populist far right became mainstream*. London, Verso Books.

Mudde, C. (2017)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Mudde, C. (2019) *The far right today*. John Wiley & Sons.

Mudde, C., and Rovira Kaltwasser, C. (2018) Studying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1(13), 1667-1693.

Pinheiro-Machado, R. Vargas-Maia, T. (2018) As Múltiplas faces do conservadorismo brasileiro. *Revista Cult*. 234, 26-31.

Pinheiro-Machado, R. Vargas-Maia, T. (2023). *The Rise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Global South*. London: Routledge.

Rocha, C. (2018) *"Menos Marx, mais Mises": uma gênese da nova direita brasileira (2006-2018)*. Doctoral dissertation, São Paulo,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Tavares Furtado, H., and Eklundh, E. (2022). Populism or the European conditio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m*. 16(2).

> 綠色協定與生態社會轉型的地理政治學

Maristella Svampa，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阿根廷。**Alberto Acosta**，經濟學家、厄瓜多制憲會議前主席。**Enrique Viale**，環境律師，阿根廷。**Breno Bringel**，State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巴西，以及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西班牙。**Miriam Lang**，Universidad Andina Simón Bolívar，厄瓜多。**Raphael Hoetmer**，策略與行動之設計、研究、組織變遷專家，秘魯。**Carmen Aliaga**，社會環境行動協調組織，玻利維亞。**Liliana Buitrago**，生態政治觀察站，委內瑞拉。

來源：Pacto EcoSocial e Intercultural del Sur。

2020年初，疫情剛發生之後，南方生態社會與文化公約成立。其目標是推動拉丁美洲由下而上的生態社會轉型運動；並尋求促進、推廣、系統化與以下各種抗爭主題相關的在地經驗，包括：社群控制、領土自治、糧食主權、農業生態學、社群能源和生態女性主義等。

此項倡議的動機，是為了應對當代世界正經歷的不同危機，同時也是為了能在拉丁美洲，提供近年出現的生態社會轉型和綠色協約替代方案。我們深

>>

知，與各大洲通過各種在地經驗所發起的環境協定倡議相比，那些帶有霸權色彩的環境協定並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其最終只會導致現狀被複製，讓如今的地緣政治／南北不平等變得更加嚴重。

兩年多過去，全球局勢更加惡化。如今的我們面臨戰爭——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導致能源與糧食危機更加劇，氣候危機也變得更嚴重。此外，戰爭更促使具有霸權主義色彩的綠色轉型剝削主義更加茁壯。

這篇文章將分析三個面向。首先，是霸權主義綠色協定的一些關鍵特徵，以及我們對其的批判。接下來，我們將從生態債務的角度出發，討論生態社會轉型的地理政治學。最後，我們會列出促進正義轉型的建議和挑戰，並勾勒出完整的生態社會正義前景。

> 霸權主義綠色協定下的南方生態社會、跨文化協定

面對生態與系統崩毀，世界各地的許多企業與政治機構已經開始將能源轉型作為目標。他們大部分都認知到應該要減少碳排放量，但卻沒有質疑當前資本主義之下的社會代謝。這類「轉型」論述和計劃，經常是以企業主義、技術官僚、新殖民主義甚至是剝削主義為基礎，而忽略了結構轉變。從南方生態社會與文化公約的觀點來說，我們應該去質疑這些方法，並將全球正義邏輯作為生態社會轉型的根基——這既是對霸權主義轉型的批判，也是替代。

近年來，綠色協議和綠色新政提案層出不窮。縱然有各式各樣多元的提案，但簡單來說，這些提案為全球北方提供了一套政治／辨證敘事，以如何減少碳排放、促進「公平」與所謂的「永續」經濟增長為主題。氣候正義往往是這些綠色公約的核心，有些還特別為層遭受負面環境影響的社群設立「補助基金」。但很多時候，氣候正義無法觸及真正的問題。在急於將能源使用轉型成可再生能源的過程中，全球北方很少考慮這種轉型對全球南方的影響。這種情況甚至會出現在各種政治左派提出的方案中，這些被稱為「綠色新政」以致敬羅斯福的提案，其內容常由國家干預社會政策、經濟監管、創造就業機會的角度出發，於此同時，其他綠色協定則為企業／市場導向的轉型創造更多空間。

全球北方的所有綠色協定都認為氣候變遷是個緊迫的問題，也認為將經濟正義與去除碳排放結合有其必要。毫無疑問地，相較於發展主義的盲目與否認，這也算是一種進步了。但是，即使至今以來野心最大的政府計畫——歐洲綠色協定，也沒有提出完整的經濟轉型方案，更甚至受到當地關鍵行動者的質疑。另一邊是美國的 Green New Deals（GND），這項協定以國會決議的形式是沒有法律基礎、不具約束力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說是展望。雖然GND是拜登競選綱領的一部分，但美國政府一轉頭，就為近海石油的開發準備好了數百萬公頃的土地。中國方面，雖然在最新的五年計劃中有一些綠色表態，但它仍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國家，且大量地使用煤炭。

許多綠色協定把生態社會轉型理解為市場導向的能源轉型。在全球北方和南方，佔據支配地位的願景是企業轉型。我們可以將這種轉型視為一種模式的延續，其具有與化石燃料制度相同的資源集中與商業邏輯，並延續了領土干預的垂直特性，是典型的掠奪性剝削主義。

鋰三角（阿根廷和智利北部，以及玻利維亞南部）即是這種企業轉型的案例，我們可以在當地看見剝削主義的重組，即為滿足北方需求而進行的綠色轉型，例如為電動車供應電池。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厄瓜多亞馬遜河流域的森林砍伐後大量出口，並供給中國建造風力渦輪機葉片。

我們必須要批判並分析這類以北方「綠色」能源轉型為名的新剝削主義。在這些霸權主義綠色協定論述中的「轉型」，指的僅是能源矩陣的多樣化。即使是最友善、最關注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如何結合的北方綠色協定，「正義轉型」的實行也往往局限於國內，而沒有考慮其將如何影響全球南方。

這些協定缺乏能源分散化、非集中化以及改變生產方式等手段，反而促進了一種具有資本主義積累邏輯，且仍然以無限增長為信念的生態轉型模式。由於這種模式必須使剝削和破壞生態的情況更加嚴重，因此，於生態代謝意義上非永續的化石燃料模型仍然得以存續。

我們的信念與這些模式相反。我們建議，應該從南方角度來思考正義轉型，才可以避免南方繼續被北方定義、重新殖民。我們也主張拋棄部門的概念，並建構出一個涉及更多領域、保有完整性的生態社會轉型願景。能源轉型如果不解決能源資源分配的根本不平等問題、不促進非商品化和非殖民化、不加強公民社會和生活結構的復原力和再生能力，最終就只能部分地改革，而不能直接解決環境崩潰的結構原因。

> 生態債務與生態社會轉型的地緣政治

我們的提案將生態社會轉型的地緣政治至於核心。從長遠來看，這意味著以拉丁美洲的歷史殖民

>>

剝削模式——相比於全球北方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為標誌來解讀南北關係、空間性與流動。從中期與短期來看，這是一個揭露國家與企業推行的「錯誤解決方案」，並認知到它們如何在多個領域進行破壞。

生態社會轉型的地緣政治有幾個面向，其一是全球不平等的加劇，這與從拉丁美洲開採原物料的加劇有關。此外，社區與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也直接地帶來負面影響。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資料顯示，從1970年以來，物種滅絕的速度急遽增加，脊椎動物的族群規模在全球平均下降了68%，在拉丁美洲熱帶地區甚至下降了94%。這些都突顯出生態債務的問題。雖然這源自於殖民掠奪，但由於生態上的不平等交換，與工業化國家的剝削性生活方式對平困國家環境的自然要求，這些情況一再惡化。

我們也必須考量到南方國家出口自然資源對環境、勞動者、和領土造成的壓力。生態債務也以另一種相關聯的方式增長，富裕國家會透過直接或間接地將污染物（廢物或排放）轉移到其他地區，或要求其他地區支付罰金（碳抵銷）而不承擔責任，來克服他們自己「國家」的生態系統的失衡。

生態債務同時也是氣候債務，且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間的歷史排放量，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例如，歐洲和北美1750年以來的碳排放，佔了那段期間全球碳排放量超過60%，而南美只有3%。這一點不容忽視，就像我們不能在思考生態債務的解決辦法時自我侷限在貨幣補償裡面。自然的商品化和隨之而來的環境成本，已經形成了一個全球不平等的剝削系統，其影響的人是種族化、殖民化的。

我們提倡更完整的一套策略，藉由對生態債務負責，以保證南方人民在整體、本體和補償正義的意義上，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相比之下，霸權主義轉型非但沒有減少地緣政治的差距，反而有加深全球南方殖民和生態債務的風險。如果不將這些債務的賠償考慮在內，任何氣候正義和生態社會轉型都是不可能的。這個涉及全球北方與南方的抗爭與批判行動，超越了任何形式的二元論和化約主義，其既能將「到底誰欠了誰什麼？」的論題推廣至全球，也能為各地的生態領土抗爭提供一套新的國際觀。

> 在能源轉型正義與整體正義的生態社會視野之間

在我們與全球南方其他現實的討論中（參見我們最近的《南方人民生態社會能源轉型宣言》），我們觀察到一種趨勢，增加海上石油開採、水力壓裂法，甚至更多大型項目，是為了滿足全球北方的過度消費。集約化的單一工業形式的農業剝削主義正在侵佔所有的水、空氣與土地資源。各國國家企業的控制程度高的令人憂慮。

雖然社會生態轉型不能侷限於能源議題，但能源系統、生產方式與社會／自然關係的結構轉型必不可少。就我們對能源轉型的理解而言，《南方生態社會與文化公約》的主旨是：

· 能源是一種權利，能源民主是維持生命之網的必要條件。
· 必須將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結合，以消除能源貧困。生態社會正義意味著打破權力關係，這種關係優先考慮社會中的特權群體，排除了弱勢群體、剝削女性化的身體與自然。
· 我們必須讓我們的社會與經濟去碳化：這在南方是個相對北方更大的挑戰，這是剝削所留下的生態、歷史與殖民足跡，也是因為原物料的儲備集中於南方。
· 必須將我們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結構，與石化燃料、開發自然的任務、將拉丁美洲定位為無限的「黃金國度」的發展主義想像脫鉤。
· 整個系統必須改變，而不僅是能量母體：去中心化、去私營化、去商品化、去父權化、去殖民化、修復與治癒。
· 我們必須轉變生產方式，轉變我們的社會關係矩陣和我們與自然的關係。
· 能源需要以一種「關係」的方式看待，所以我們必須表現出我們對能源的相互依賴與生態依賴。
· 重要的是要警惕「錯誤的解決方式」，例如，對可再生能源、鋰、和其他轉型礦物的限制和雙重標準。這包括與企業與國家在締結國會議（COP）等領域達成共識的關鍵觀點，這些共識旨在實施為南方考量具有爭議的能源模型，如綠色、灰色、或藍色氫、智能農業、碳市場、地球工程，與其他會維持當前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之間的權力關係與能源不對等的項目。
· 石化燃料要被留在地下。
· 我們必須從區域或南方的角度，不只從貨幣方面，還要從結構與象徵方面收回生態債務。
· 重要的是，我們要降低並減少社會代謝：用更少的物質與能源生產，減少消費——重新定義我們對幸福的理解，遠離物質和金錢。

在這些策略外，還必須依據不同的現實情況提出具體的意見。這就是我們最近試著透過與 CENSAT Agua Viva 以及其他拉丁美洲組織一起推動的 Disminución planeada de la dependencia fósil en Colombia 在做的事，這是一個集體提案，旨在與哥倫比亞政府提出的，由Gustavo Petro 與Francia Márquez Mina 主導的能源轉型提案進行對話。

>>

《南方生態社會與文化公約》對我們的區域所進行的改革過程十分敏感，同時也意識到逆行與寡頭勢力的重要性，我們將持續前進，把抗議與建議、批評與發展的替代方案結合起來。我們將接受近幾十年來在運動抗爭中形成的思想與概念，並堅持守護這些信念：自然的權利、良好的生活、再分配正義、關懷、轉型正義、自治、後剝削主義、生態領土女性主義、糧食主權與糧食自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捍衛一個完全不同的協議：不是尋常的肥貓間的協議與交易組成的霸權性的《綠色協定》，而是一份來自南方、為了南方、與地球的協議，正如Arturo Escobar在介紹我們的倡議中所提出的那樣，一種對其他生活方式的承諾，以及與世界同在、生活在世界上的承諾。■

來信寄至：
Pacto Ecosocial del Sur
<pactoecosocialdelsur@gmail.com>
Twitter: @SvampaM / @AlbertoAcostaE / @EnriqueViale/ @brenobringel / @lilib17 / @ColectivoCasa / @PactoSur

> 為了百分之一的發展

Vandana Shiva，Navdanya 自然、科學與生態研究基金會，新德里，印度

小農實際上比大型工業化企業農場更有生產力，因為他們不會使用破壞環境的商業添加劑，如化肥、農藥和基改種子。
插圖：Arbu，2023。

我們不應停滯在「發展」論述和由資本主義父權思想塑造的國內生產毛額思維，而應重拾我們作為地球公民的真實人性。正如 Lessem 和 Schieffer 在他們的著作《Integral Economics》中寫道：如果提出資本主義概念的人們不是選擇一位單身中產階級男性作為理論架構中最小的經濟單位而是選擇一名母親的話，他們就無法用相同的方法得出人天生自私的公理。

資本主義父權制的經濟型態在戰爭和暴力中被形塑——反對自然和多元文化的戰爭和針對女性的暴力。原先的目標是擁有和控制自然和人造的真正財富，然而，競爭市場的「邏輯」等虛構的經濟概念有

>>

逐漸取代實際物質的傾向。分離是父權主義和資本主義後出現的典型核心特質。首先是自然和人類的分離，再來是人與人之間基於性別、宗教、種姓制度和階級的分離，這些把相互連結的事物進行分離的行為是暴力的根源—剛開始在腦中發酵，之後便存在在日常行為中。毫無意外，過去的社會不平等隨著企業全球化的發展而發展出更殘暴的型態。根據現下趨勢便可以輕易地發現，全球前百分之一的人口所控制的財富將會與剩下的人口所持有的一樣多。

現今，集團聲稱法人的人格優於實際人類的權利，但虛構事物與創造財富的實際來源之間的距離卻更遠了。資本成了金融的替代品，並以工具和技術使有錢人能夠不做任何事，僅透過投資收益增加財富。在金融經濟學中，賺錢的方法是立基在投機上，而放寬金融管制讓有錢人使用別人辛苦賺取的錢財進行投機。政府和大眾都將「成長」的概念作為成功的衡量標準，它涉及了一種發展形勢和由其衍伸的危機：全球經驗和由在資本父權主義中掌權的那群人所立下的典範，都只是為了讓這群人能夠擁有更多財富。

經濟學原理忽略掉的是自然和社會中生命的破壞。生態（Ecology）和經濟（Economics）二字皆源自於希臘文「oikos」，代表家的意思；生態和經濟都指涉了一種家庭管理形式。當經濟和自然科學背道而馳時，會導致地球，也就是我們的家，遭到錯誤的對待。

氣候危機、水資源危機、生態多樣性危機和食物危機都是沒有妥善規劃地球資源的徵兆。因為人們沒有意識到大自然作為「真正的資本」和一切事物的「資源」，而將地球維護得一塌糊塗，並破壞它的生態循環。在沒有大自然和維持地球生命的生態過程，偉大的經濟會崩潰、文明會消失。

在當代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下，貧窮來自於世界前百分之一的人口奪走了其餘人的生存空間、資源和財富；我們可以從被迫移居的中東羅賈瓦地區和緬甸羅興雅人身上清楚看見這樣的狀況。這群世界前百分之一的人們推動工業化農業，以昂貴的價格販賣種子和農用化學品，不只使得農夫們變得越來越貧窮、陷入債務困境，同時也破壞了土地、水質、生態多樣性和農夫們的自由。

我的書《Earth Democracy》講述了孟山都公司如何透過炒作基改Bt棉花壟斷棉花種子供應市場。為了購買昂貴的基因改造作物和所謂的綠色革命技術，許多農夫因此被迫負債，在過去二十年間有超過三十萬的印度農夫自殺，而從事棉花產業者佔多數。為了對抗這般暴力的壟斷，我成立了一個名為Navdanya 的鄉村研究農場，保存下農夫們種植的多種傳統有機棉花，並在種子自由運動中發放。

如果農夫們變得更貧窮，一定是因為這個目前降至三人的毒梟集團——Monsanto Bayer、Dow Dupont 和 Syngenta Chem China，讓大家不得已購買昂貴的種子和農用化學品。從種子到農用化學品，再到國際貿易和速食製造加工產業，垂直整合型態的公司剝奪了農夫九成九的生產價值。農夫們因為自由貿易提倡傾銷、破壞生計，並壓低農作物價格而變得更貧窮。除此之外，小農其實比工業化農場更具有產值，即使沒有使用對環境有害的肥料、農藥、基改種子等添加劑。同時，全球農夫組織農民之路指出，傳統的棉花生產方式不只給予農夫更多的自主權，更有可能減緩全球暖化的發生。

不言而喻，佔「經濟成長」前百分之一的人們是反生命的，並且他們的行為也同樣影響到全球北方的勞動人口。菲律賓的非政府組織 IBON International 表示，如果過去傳統的男性暴力是用來使女性保持作為勞工和再生產工具的角色，那麼現在的男性暴力便是為資本主義的盈利提升而服務。政府被那百分之一的人給掌握，並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經濟組織的核准下，於健康和教育、公眾交通、能源等方面強行推對盈利私有化政策，因此使得各地的人都變得越來越貧窮。

勞工、農夫、家庭主婦和整個大自然都被佔宰制地位的資本父權主義經濟模式視作「殖民地」。全球化下，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型融合了兩種形式的暴力：過去的父權文化與現代貨幣法則的結合。■

來信寄至:
Vandana Shiva
<vandana@vandanashiva.com>
Twitter: @drvandanashiva

>「Buen Vivir」：系譜學和展望

Mónica Chuji，亞馬遜基楚瓦族知識分子，前通信部長，厄瓜多；**Grimaldo Rengifo**，Proyecto Andino de Tecnologías Campesinas (PRATEC)，秘魯；和 **Eduardo Gudynas**，Centro Latinoamericano de Ecología Social (CLAES)，烏拉圭

Luísa Acauan Lorentz 在巴西阿雷格裡港農村地區一棟房子的外牆上繪製的壁畫。
來源：Luísa Acauan Lorentz，2022年。

Buen vivir 或「良好生活(living well)」這個範疇闡釋了從南美視野針對發展和其他組成現代性核心議題的激進批判，同時並提供能超越自身的另類觀點。這與西方所理解的「良好狀態(well-being)」或美好人生(good life)不大相同，更不能描述成意識形態或文化。其能被視為一在知識、情感與心靈上的深刻轉變：即從認識論上敞開了理解人與非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意味著社會與自然在現代產生的分裂，而其作為複數的範疇仍在構組的階段，且在不同地方和區域間有著不同的形式，並同時混合原住民對現代性永恆批判的特質。關於 buen vivir 這個概念在二十世紀中期已被紀錄，但其現代意義要等到1990年代才被明確地闡釋。

對此概念貢獻良多的有秘魯的安地斯農業技術計畫、玻利維亞的安地斯農業與畜牧業發展部中心與其他知識份子，還有厄瓜多的社會與原住民領袖 Alberto Acosta 大力支持。眾多的社會運動支持這個理念，並在玻利維亞和厄瓜多帶來政治的轉變，且獲得憲法承認。Buen vivir 也包含了不同社會、歷史和生態的特殊情境，這來自於創新，以及來自原住民傳統概念與現代性本身批判姿態的聯繫和混合。此一概念包括艾馬拉人的 suma qamaña，玻利維亞瓜拉尼人的 ñande reko, sumak kawsay，厄瓜多蓋丘亞人的 allin kawsay和秘魯克丘亞人的allin kawsay。厄瓜多/秘魯的shür waras和智利馬普切人的küme morgen 是類似的概念。而西方所貢獻的概念中則提供了對發展的激進批判，包括後發展主義、殖民權力與知識的承認、女性主義對父權的批判、承認非人類內在價值的另類倫理與環保視野如深層生態學。

因而，在這並沒有單一概念，如厄瓜多的 sumak kawsay 和玻利維亞的 suma qamaña 兩者是有所差異的。在前面的例子大致上翻譯成西方範疇中指涉在社群中良好與和諧生活的技藝，也同時在社會與生態上進行定義。但，後者也指涉在特定地區的混合社群一起生活，所以如果說 buen vivir 排除了原住民的特性也不大對，更應該說這是回到了殖民前的條件；這些的貢獻對概念的構建至關重要。

這裡頭也存在著超越了多元範疇的共同組成(Gudynas 2011)。所有這些概念都對單一普遍歷史的概念和進程提出挑戰，其為開放、多樣、並行、非單一敘事和甚至循環的歷史進程，並質疑其發展著迷於經濟成長、消費主義與自然商品化等。這樣的批評超越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不同發展，從這個觀點來看，社會主義的 buen vivir 似乎沒什麼道理，因為這樣的替代方案同時是後資本與後社會主義的，從脫離成長並聚焦在從緊縮政策的角度來完全滿足人類的需求。Buen vivir 取代以人為中心且是唯一具有政治代表性主體與所有價值來源的觀點。

>>

同時這也敞開了道德上的論述(藉由承認非人的內在價值和自然的權利),也敞開了政治的面向(承認非人的主體)。在面對父權體制上,即使是在農村和原住民領域的核心區域,也提出了女權主義的替代方案,以恢復婦女在保護社區和自然方面的關鍵作用。人文與自然在當代的裂解也被挑戰:buen vivir 承認在特定的區域擴展其社群至人類與非人的動物、植物、山岳、靈體等。其中一個例子即是安地斯概念中的ayllu :混合了根植於特定區域的社會生態群體。

Buen vivir 拒絕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並和多元文化保持一定的距離。相反地,其推崇重視各種傳統知識間的跨文化性,從而在多民族的基礎上去重新定義政治。buen vivir 也非常重視情感和靈性。在擴展社群中的關係上不限於市場交換或功利連結;相反地其結合了互惠、互補、共產和再分配等。

Buen vivir 背後也有著尖銳的批評。有人認為其簡化了原住民知識的概念,而其他人則認為實際上是新時代的發明。傳統的左派知識份子堅信其分散了對真正目標的關注,真正的目標不是發展替代方案,而是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他們同時也不承認非人的內在價值。在這些論辯外,Buen vivir 卻是在安地斯地區國家取得廣泛且強而有力的支持。於此,其也在拉丁美洲與世界迅速傳播,為此提供了發展的特殊替代方案基礎,如同在憲法上承認自然的權利和大地女神帕查瑪瑪;暫停在亞馬遜地區的鑽探;提供後開發主義轉型的模型;基於非人類施為者也能參與的世界政治。

在這些 buen vivir 的原始觀念和玻利維亞和厄瓜多政府發展政策間的激烈衝突中,促進大型採礦或亞馬遜石油開採等開發主義做法的已經非常明顯的例子。例如,「進步的」政權必須透過 buen vivir 的新定義來克服這些爭端,無論是將其視為社會主義的厄瓜多或不可或缺的發展的玻利維亞,都必須將其置於現代性之中思考。這些立場已被許多國家機關、知識份子和非南美知識份子支持,而非南美知識份子不管其意圖為何僅僅只是在制定殖民的概念而已。除此之外,buen vivir 的原始概念已被保留,並持續促使社會對發展的抵抗;例如,在玻利維亞、厄瓜多和秘魯的原住民和公民針對捍衛領土、水源和大自然的示威抗議。這些示威抗議的參與不僅限於少數知識分子和非政府組織,而且已經獲得民眾高度的支持。

總結來說,buen vivir 是一個現在進行式的芻議,由不同的運動和行動者支持,有其進步和倒退、創新和衝突的地方。其無法避免的仍在架構組織中,因為現代性是個難以超越的鴻溝。其必須是多元的,因為在這之中包含了質疑現代性的立場,同時開拓植根於特定歷史、區域、文化和生態的思維、感受和存在—其他本體論—方式。然而,在這種多樣性中有明顯趨於一致地將其與現代性區分開來,如拒絕現代性對進步的價值,承認源於相關世界觀的所擴展形成的社群,以及接受非人的內在倫理價值。■

在 Twitter 上追蹤作者:
@Monicachuji / @PratecPRA / @EGudynas

> Ubuntu：一種正義且賦權的概念，及其生活方式

Lesley Le Grange，Stellenbosch University，南非

馬達加斯加，猴麵包樹大道。
來源：Antoni Socias，Unsplash。

Ubuntu 是一個來自非洲南部的概念，意指人性，也暗指一種人類存在的條件或追求的狀態。它關注於揭開人與人、人與非人世界的關係。換句話說，人的發展是有賴於其他人類和宇宙。此外，ubuntu 認為人並不是西方傳統下的原子化個體，而是嵌入在社會和生物物理關係中。

因此，Ubuntu 是「反人文主義」的，因為它強調人的關係性存在和發展。Ubuntu 源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數種語言中的諺語或格言。在南非使用的恩古尼語言（Nguni）中的祖魯語（Zulu）、科薩語（Xhosa）和恩德貝勒語（Ndebele），ubuntu 源於 Umuntungumuntungabanye Bantu，指一個人的人性會在他與他人的關係中展現，因此，也是其人格特質的真實展現——「我們在，故我在。」Botho 在索托-茨瓦納語（Sotho-Tswana）中有相同的意思，這個詞源自諺語：Mothokemothokabathobabang。Ubuntu 也是人類的核心元素之一。在祖魯語中，umuntu是人類的意思，而它由以下部分組成：umzimba（身體、形式、肉體）、umoya（呼吸、空氣、生命）、umphefumela（影子、精神、靈魂）、amandla（活力、力量、能量）、inhliziyo（心臟、情感中心）、umqondo（頭腦、大腦、智力）、ulwimi（語言、口說）和 ubuntu（人性）。

>>

> 恢復一種傳統的生活方式

然而，Ubuntu 不僅是一個語言上的概念，它也具有規範性的內涵，體現人們應該如何與他人建立連結——什麼是人們對他人的道德義務。Ubuntu 主張人們的道德義務是關心他人，因為當他人受到傷害時，我們也會受到傷害。這種義務可以延伸到所有的生命，因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相關的：當我傷害自然時，我也會受到傷害。

就如同所有非洲文化的價值觀，ubuntu 藉由口語和傳統文化的方式代代相傳：其意涵交織在非洲人民的文化習俗和生活經歷中。這種文化價值受到殖民化的侵蝕與抹煞。然而，在後殖民時代的非洲，ubuntu 及與其相同的概念被重新喚起，成為去殖民化方案的一部分；ubuntu也得到越來越多國際上的關注，用來替代以發展為主流的觀點，因為發展會威脅實踐社會正義和環境永續的可能性。例如，有些南美洲的非裔群體正在運用 ubuntu 以更細緻的解釋 buen vivir。

> 一種正義且賦權的概念

Ubuntu 傳達了一種理念，即一個人若是以剝削、欺騙或不公正的方式對待他人，則無法實踐或表達真實的自我。沒有他人的存在，一個人就無法玩耍、運用感官、想像、思考、推理、創作或控制周遭的環境。因此，Ubuntu 描繪了人與人間、人與非人世界間的團結。在全球社會運動的關注核心——爭取社會正義和環境永續的抗爭中，它可以用來建立人類之間的團結。

這個概念包含了一種構想：人類的自由和創造力只有在傷害他人時才須要受到限制。Ubuntu 是所有眾生內在的力量的體現，它有助於改善生活，且從不阻礙生命。它是一種富有生產力、促進連結並產生關懷和共感的力量——它是大眾的力量，是社會運動的動力。它的相對形式：強迫、分裂、殖民的權力——超國家組織、政府、軍隊和企業界所行使的主權，這種形式的權力侵蝕了 ubuntu。

> 多重向度的變革

Ubuntu 具有變革的潛力，它提供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一種另類的解讀：人類之間日益加劇的不平等、迫在眉睫的生態危機，以及人類與新科技的複雜交織，甚至難以確定什麼是「作為一個人」。關於最後一個問題，ubuntu 將肯認人性的重要性浮上檯面，這不是透過定義「什麼是人」來宣稱其他實體為「非人」，而是一種在新興科技的脈絡下逐步展現人性的過程。當解決不平等只聚焦在人類身上——它是以人為中心的；而解決生態危機將目標擴展到非人世界——它是以生態為中心的。Ubuntu 具有變革性，因為它超越了以人為中心（anthropo-centric）和以生態為中心（eco-centric）的二元對立。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該被看作是宇宙內部關係的一個縮影。因此，培養自我或關心他人，與關注非人世界並不對立—— ubuntu 不能簡單地被歸類為以人類為中心或以生態為中心的範疇。自我、社群和自然彼此密不可分——治癒一個面向也會帶來其他面向的療癒，而痛苦也是如此水平地存在於三者之間。因此，爭取個人自由、社會正義和環境永續可以被視為是同一種抗爭。

> 注意濫用

不難發覺 ubuntu 有兩個可能的限制。首先，以狹隘的種族中心主義來解釋此概念，可以在政治上用來排斥他人。我指的是，某些在後殖民非洲獲得政治權力的團體可能會聲稱這個概念屬於他們——即使這與該術語的含義互相矛盾——或者認為它不該被嚴格審查。換句話說，ubuntu 可能會淪為狹隘的人道主義，從而導致暴行，例如近年出現在南非的排外心理。其次，由於此概念的吸引力，超國家組織、政府和企業界可以使用 ubuntu 來滿足他們自己的進程；或者基於西方思維的主導地位，它可能會被同化到西方的文化檔案中，進而侵蝕其本土性。■

來信寄至：
Lesley Le Grange <llg@sun.ac.za>
Twitter: @LesleyLeGrange

> 爬梳生態女性主義辯論

Christelle Terreblanche，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南非

於墨西哥恰帕斯州薩帕提斯特 Caracol Oventic 地區一棟建築外牆的壁畫。來源：Vitória Gonzalez，2017年。

生態女性主義者呈現出父權征服女性與人類支配自然兩種觀點間的連結，包括從歷史的、物質的和意識形態的觀點切入。參與在不斷發展的社會運動中，她們談到女性主義、去殖民主義、環境倫理等多種政治理論，促使人們去探討常識是如何鑲嵌在傳統的性／性別框架，並被其腐蝕。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在1960年代開始發展，當時就受到許多草根行動的啟發。隨著1970和1980年代的反核與和平運動，以及大眾開始更加關注環境惡化問題，生態女性主義隨之蓬勃發展。無論是有毒廢棄物、種族暴力、剝削照護人員、生物多樣性喪失、森林砍伐、種子商品化，或是以「發展」之名掠奪傳統領域，只要威脅到物種的社會與生態再生產，就能見到女性運動者的身影。

生態女性主義者主張：如果不解放所有「他者」，人類就不可能從歷史的父權體制中解放。她們看到全球北方的婦女和全球南方的農民與原住民如何凝聚成一股貨真價實的政治立場，因為這群人都具有照顧人和非人生命的技能。作為一種政治主張，生態女性主義是獨樹一格的，它不僅只是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或生態學的一個分支。生態女性主義的思想結合了環境正義與環境完整性的論述，並藉此闡明女性主義對社會平等的關懷。

> 促進自我反思的重建革命

生態女性主義有時被視為是復興「所有生命皆相互關聯」的古老智慧。有一個例子是印度的「抱樹運動（Chipko）」，幾個世紀前，婦女們用手臂環繞著樹木，為了保護森林免遭被砍伐的命運。不過，生態女性主義這個術語的出現是來自法國女性主義

>>

者 Françoise d'Eaubonne，她在 1974 年號召發起一場拯救生態圈的革命：徹底重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同時也重建男女之間的關係。先驅理論家 Carolyn Merchant 對歐洲科學革命的歷史分析，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揭示現代性之父決心藉由制度化獵巫來控制女性的生育主權。草藥醫師和助產士的專業知識被「醫學專業」取代，自然和身體被視為「機器」。這種概念罷黜了女性照護勞動中既有的預防原則，同時強化了一種古老的二元本體論，即理性男性的優勢地位，與對「不守規矩」的女性和「混亂」的自然等「他者」的控制。

主流的自由現代主義者經常錯誤地理解生態女性主義批判，這反而回過頭強化了父權主義的思維，即認為女性或當地人「本質上更接近自然」因而較為次等。事實上，生態女性主義者解構了源自於「人定勝天」這種舊霸權思想的二元概念，展現具有性／性別、種族和階級優勢的人如何利用二元論述「他者化」他人，以維持自身的社會支配。從這種角度理解，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可以幫助深化一個人的自我反思，理解現有權力關係如何作為自身的優勢。

> 女性的勞動、生態知識和唯物主義批判

全球女性從事65%的工作，只賺取10%的工資；而在全球南方，女性生產的食物佔所有消費食物的60%至80%。Maria Mies 及其德國比勒費爾德學派（Bielefeld School）的同事提出了一種「生存觀點」，他們對殖民地非洲和南美洲進行研究，證實了婦女和農民作為生產者和糧食供給者[1]所具有的生態知識。自1980年代以來，這種經濟論點運用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後發展的政治主張，期待能提出對當代發展的替代方案，例如拉丁美洲原住民的 buen vivir 或「美好生活」世界觀，或是近期歐洲社會所關注的去成長和團結經濟。另一個揭露「發展不良」（maldevelopment）的例子是，Vandana Shiva 指出在引入20世紀綠色革命科術後，印度婦女農民喪失了原本實踐的公共糧食主權。

金融和技術修正加劇了生態危機，生態女性主義者揭露出資本主義在此過程中是如何挪用複雜的階級、種族和性別特徵。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以勞動為基礎的唯物主義政治，它是非本質主義的；它連接富裕、工業化的全球北方的過度消費與它在全球南方的「水龍頭和水槽」（taps and sinks）。正是資本父權生產主義邊緣地帶的污染性後果——成為原住民社群的生態負債，也是婦女和後代子孫的身體化負債。Ariel Salleh、Mary Mellor、Ewa Charkiewicz、Ana Isla 等唯物主義生態女性主義者連結人類生存與生態永續性[2]的概念。她們結構性地批判化約論經濟學觀點，指出它對家庭和農地中的再生產勞動，以及資本主義所依賴的自然循環視而不見。

> 生態女性主義對環境危機的超工業回應

農民和原住民——概念化成一個佔全球多數的「超工業階級」，他們的能力表現出「身體化唯物主義」的倫理與認識論。他們跟隨著自然運作進行再生產，這就是面對環境危機的現成的政治與物質回應。這些勞動者存在於世界各地，在大量且零碎並易被忽視的非異化勞動中，在人與自然關係的複雜網絡中延續生命。超工業勞動者為生態循環注入積極的「代謝價值」。顯然，生態女性主義擴大了傳統馬克思主義進行階級分析的焦點。並且，左派學界對於理論概念的討論也更為深入，開始關注透過再生產勞動進行的資本挪用背後的「自然化」（naturalized）基礎。然而，女性的理論化成果總是有可能被重新包裝到現有的父權整合敘事中。

> 融合的公共解放和關懷

生態女性主義的政治目標是藉由以共享為基礎的再生團結經濟促進人類解放。她們看重複雜性先於同質性、合作先於競爭、公共財先於私有財、使用價值先於交換價值。這種政治解放開始被接受，因為它能闡明綜合生態學、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和以生活為中心的部落倫理（例如印度的 swaraj 和非洲的 ubuntu 精神）的討論。關注於追求平等與永續生活的後發展替代方案，它能提供系統性的社會學分析基礎。生態女性主義者主張一種關懷所有生命形式多樣性的世界觀。■

來信寄至：
Christelle Terreblanche
<terreblanche.christelle@gmail.com>

註1.Mies, Maria and Shiva, Vandana (1993)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
註2. Salleh, Ariel (Ed.) (2009) *Eco-Sufficiency and Global Justice: Women Write Political Ecology*. London: Pluto Press.

> 自然權利與地球法學

Cormac Cullinan，環境律師，南非

Pachamama（中國紙上水墨）。
來源：Luísa Acauan Lorentz，2019年。

多數當代文明的組織形式都是以最大程度地增加 GDP 為目標，不過這樣的形式將使環境惡化、導致氣候變遷。如果這些文明沒辦法回頭向善，將促進人類福祉的方法轉向提升生態的豐富度與生命力，那麼他們很可能會在21世紀面臨崩潰。自然權利（又稱地球母親權利）的倡議者認為，為實現此轉變，我們必須在法律制度中承認、維護自然作為一個法律主體，在任何意義上所擁有的固有權利。從法律上承認自然權利，不僅賦予人類／法人尊重自然權的義務；其背後更蘊含著重要的概念，即將人類視為自然中的物種之一，因而人權也是自然權的一部分。

自然權的法律承認議題，其實只是地球法學、其他生態取向的人類社會治理方法等討論的一個面向。地球法學是法治哲學的一個分支，其目標是為人類在地球社群中和諧共處提供指引，而非合法化、便利化人類對於地球的開發與貶低。在此種概念下，自然權就像人權一樣，是固有的、不可剝奪的，且是隨著權利者的存在而產生。包含人類在內，自然界中的每一個面向、每一個存在，都至少擁有存在、占據一個物理位置的權利，也應該要能為了在生態、進化過程中履行其獨特作用，而保有與其他生命互動的權利。

>>

> 法律明定的自然權

當代最關鍵的自然權相關表態之一，是2008年9月通過的《厄瓜多憲法》。2010年4月22日，在玻利維亞科恰班巴舉行的氣候變遷和地球母親權利人民世界大會（UDRME）上，則有《世界地球母親權利宣言》發表。厄瓜多的憲法第71條即規定：「大自然／Pachamama，是生命繁衍和存在的地方，其有權利存在、持續存在、維持及再生其重要周期、結構、功能和進化過程」。由此可見，明文確立自然權的法律地位，是為了創造一套框架——在這套框架下，公民將享受權利、行使責任，並透過通過在自然中和諧共處實現福祉。除此之外，這套法律框架將要求政府依循此概念來建立往後的發展模型，並確保國家及個人都能夠尊重、維護自然權。紐西蘭已經立法承認旺格努伊河和尤瑞瓦拉地區是擁有權利的法律實體；印度也明文規定恆河和亞穆納河所流經的根戈德里地區、Yamunotri 冰川以及周圍的森林、水道，都是擁有權利的法律實體；哥倫比亞憲法法庭，也承認阿特拉托河流域是一個法律實體，有權受「守護、維繫、保養及修復」。

> 消費主義的世界觀

現代性、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皆根植於人類中心主義，即人類是獨立於自然、且可以超越自然法則的。這種人類除外的觀點，將地球視為一個資源的集合體，它的存在止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由於多數人認為資源是稀少的，為獲得更多資源而與他人競爭也因而成了最重要的目標。這種世界觀是大部分現代法律體系的思想背景，其將人類之外的自然定義為「財產」，並將與這些「資產」有關的大部分決策權和壟斷權授予財產所有者。這為如今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提供了基礎，使得財富、權力和法律決策權集中於少數人身上，並將這些少數人的短期經濟利益，置於地球社群和生命本身的集體利益之上。

> 生態中心的世界觀

相較於消費主義世界觀，以生態為中心、且承認自然擁有權利的世界觀，則將人類視為地球上的生命形式之一；與其他自然生命相同，人類也同樣在地球社群中發揮著獨特但並非卓越的作用。UDRME的序言和第一條規章是這樣說的：地球是一個自我調節、由相互關連的生物組成的生命共同體，所有生命的存續都依存於共同體本身；因此維護整個地球社群的完整及健康，將是首要考量。自然權利倡議者指出，量子物理學、生物學和生態學等各個科學分之的研究，早已證明宇宙中的每個面向都是互相連結的，這就反駁了主流那套人類與自然分離、高於自然的信念。此外，這套世界觀也借鑒了古老的智慧、傳統以及原住民的宇宙觀，將地球視為一個神聖的生命共同體，其需要人類尊重其他生命。

地球法學與自然權利的概念，從根本上挑戰了主流的「發展」論述、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並對於人類的作用、人類社會的根本目的，以及如何促進人類福祉，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例如，從生態中心的角度來看，「發展」指的是個人如何在理解自身與生命共同體之間的關係或「相互存在」意義的過程中，於深度、復雜性、同理心和智慧方面有所成長。這與強調利用、貶低複雜的自然系統，以增加 GDP 的當代主流發展論述，是完全不同的。

> 新的運動與宣言

自2008年以來，自然權利和地球法學已成為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環境與社會正義倡議者，以及原住民論述中日益突出的面向之一。這些概念已經成為聯合國內部討論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核心，並被納入一些綠色和生態社會主義政黨的方案中。自然權利和地球法學不僅處理了當代環境和社會問題的最根本的源頭，更提供了一個超越種族、階級、國籍和文化的宣言。除此之外，它們基於宇宙如何運作的觀點，比起人類中心主義、機械主義和還原主義的世界觀更為精準。自然權利給了全球各地的權力運動一劑強心針——既然人類權利的社會規範是可以被改變的，那麼有關哪些人類行為才合理的社會規範，也是可以迎來改變的。雖然自然權利運動仍處於起步階段，但其影響力可能會持續快速地增長，並最終產生重大的全球影響。■

來信寄至：
Cormac Cullinan
<cormac@greencounsel.co.za>

> 後疫情趨勢與現代性的諸階段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State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巴西，ISA 社會學理論（RC16）及歷史社會學（RC56）研究委員會成員

於2019-20年降世的新冠疫情暗示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將發生的巨大改變。自2008年起，新自由主義已經受到約束。忽然的疫情帶來了所謂的緊急凱恩斯主義以及為了讓國家不至沉淪而大幅度擴張的社會政策。只用了短短幾個月甚至幾天的時間，那些不可想像的事都成為了可能：所採取的應對措施和對經濟及安全網投入的資金數量令人震驚。憑著其「效能」以及為了面對現實的處境，國家驚人地回歸了[1]。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嗎，或者說，其實我們觀察到的不過是無關緊要的變化？這樣的轉變是否會持續？這是為相對穩定的政策軌跡畫上句點的時候了？[2]接下來，我會優先討論現代性的諸階段，來就國家對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干預勾勒一個答案。嚴格地來看看政治系統，始終保持著連續性，儘管社會的許多方面都要求進行深層的變革。自由民主是一個混合的政體，而自 1980 年代以來展開的更多的寡頭政治和更少的民主的趨勢（朝更極端的寡頭政治系統前進）並未被扭轉。監視明顯地增加。儘管對更健全的社會政策的要求不斷增加，政治家們還是只關心自己、關心他們的權力和財富。個人主義蔓生，新冠疫情可能加劇了它並引發了主要防衛性及私人導向的態度，與一個世紀前的「西班牙流感」疫情後社會性的加強形成強烈對比。這些當然是有待社會學去加以分析的問題。而我於此不得不說的事只部分地適用於更新的黨–國兼資本主義系統的世界，在那裡國家的在場要強烈得多且有一個更具權威的政治系統在運作。然而，從社會政策來看，社會自由主義的盛行說明了這點。

> 現代性及其諸階段

現代性——包括政治現代性——是一場偶然的漸進分歧。然而，它是透過雜交化而奠定在先前發展起來的具有逐增的全球性特徵的文明元素，從而憑藉其支配性力量克服了專制集體主義所帶來的相對短暫的挑戰。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它在三個不同階段上發展（如 Offe、Lash 及 Urry 等人的工作所顯示的）。第一個階段是自由主義和市場導向的（或可視此為一種計劃）；它同時是殖民主義的（儘管美洲已經獨立）。第二個階段是以國家為基礎的，可說是世界通行。儘管自由主義的經濟和司法結構持存著，但「真正的社會主義」（更恰當地說是專制集體主義）則激化了它從現代性中借用的國家元素，並拋棄了自由主義和市場基建。接著，伴隨著更強的網絡在場——貼緊市場與國家的強化——並在新自由主義的庇護下，更為複雜，更為個人主義式的第三階段開始了。

我們是否在一個後疫情的世界中，見證著一個新階段的出現，又或只是第三階段的某個拐點？在黨–國範圍外，新自由主義已經佔據主導地位直到如今（且其支持者也在努力維持其主導地位）。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假設現代性的第三階段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合作僅僅是偶然的，不管它將在世界留下多麼深刻的痕跡以及究竟發生了什麼。

> 國家、經濟與社會政策

早在疫情前，新自由主義已被認為在應對經濟的問題上太過有限；或明或暗地，各國政府已經開始擯棄其某些原則，而如今強大的代理人似乎也越來越意識到這個問題。然而，伴隨發展常常遭遇的不一致、阻力和不透明，實施變革的過程變得更加複雜。雖然我不能於此展開這個問題，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和競爭也是上述轉變的背景，前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使用了新自由主義和強國家干預的組合技。

>>

「我們應該將其視為跨時代的改變，還是一些不太重要的變動？這種轉變會持續下去嗎？」

讓我們以歐盟為例。我們可以分辨三種可能的未來情境：一種是保守的（一切照常）；一種是有點混亂與衝突的；一種是隨機應變的，其中的目標是應對氣候變化（尤其通過能源轉型）、數位化、改革社會政策以及稅收變化。透過向市場借貸而來的共同資金，「下一代歐盟」計劃已經將歐盟推向了第三種可能，伴隨著「歐洲國家」（按：指歐盟）的強化，從而甚至使強大的民族國家的任務變得容易（透過與它們結合；比如，通過資助高達40百分比的法國重啟計劃使該計劃在2030年之前的技術更新得到實現）。至於稅收，除了為避免各公司的避稅天堂計劃或更一般地說，逃稅，而採取的對各公司徵收15分比的全球統一稅率外，沒有太多的討論（美國除外，在那裡富人稅被削減）。無論如何，專家和政治家在疫情時期討論許久的全球企業稅率可能仍被限制，如批判家所爭論的那樣，這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力量增長與否是有爭議的（例如在德國，避免遵守禁止進一步舉債的憲法條款的做法已經被採納，幾乎沒遇上什麼麻煩），但朝著這個方向的運動可能會推進。無論如何，政治系統將調解這些監管變化。在美國，經過激辯，民主黨在2022年8月最終批准7400億美元的項目以應對通貨膨脹，並推動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以及降低醫藥成本，這是一個突破，儘管比左派希望的要溫和得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為經濟基建的更新提供資金的建議，尤其是在數位化方面但也包括更一般的東西比如橋樑和道路，並允許能夠緩解美國和歐洲正在發生的氣候變化的能源轉型。戰略性的，特別是那些高科技的地區可說是最緊要的，其中微芯片尤其突出；大量金錢和國內社會組織將促進此類目標和國家對創新產品的採購（國家對新冠病毒疫苗的支持證明了這種戰略的有用性）。產業政策正在捲土重來：儘管與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盛時期有很大不同（在於更具「指示性」），但與20世紀最後四分之一和21世紀初的情況相比，它已經變得更加相關。有人談到規劃的回歸，特別是關於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無論如何，預算的限制整體上已經變得更加寬鬆——而支出變得更有彈性，甚至包括許多救助行動。

在貿易和金融監管方面，一個真實的變化正在發生。幾十年來，反托拉斯政策在被認為已經不攻自破的情況下被輕視了。自雷根政府以來，它們就被假定要和消費者福利一起考慮。因此，傾銷、降價等打敗競爭對手的行為就不被視為一個問題。目標是保護競爭本身，而非特定的競爭者。如此以來，透過合併和融合從而創造巨大寡頭壟斷的行為便不值得干預啦。這正在被徹底修正，反托拉斯政策更加全面和詳細。此外，監管方案已經從典型的和更有限的美國制度取徑擴展到處理面向消費者的市場服務，特別是基本壟斷類產品（電話和郵政、水和污水、或火車和航空）以涵蓋社會政策與其它活動。

然而，至於社會政策，我們似乎看到更多類似的情況。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以其雙層政策——一層是為富人提供市場基礎；另一層則是為窮人提供國家供應——已經成為常識。到目前為止，在社會政策的演進中，還未確實出現過能夠動搖穩步擴張的社會自由主義的穩定性的關鍵點。然而醫療保健可能更加普及，因全球化的、社會自由主義的回應第一次以似乎更普遍的方式出現了。雖然過去存在顯著的差異，特別是在全球系統的中心（包括一些專制集體主義國家）以及外圍之間，前者具有更堅固的和趨向於普遍主義的政策，但目前社會自由主義無疑地在全球範圍佔據了上風。它專注在貧窮——關鍵是公平（equity）而非平等（equality）。儘管存在廣泛的社會不滿，還沒有過任何組織表現出足夠的力度，或甚至曾嘗試過，使社會政策導向普遍主義和充分的社會公民權。

顯然地，現金轉移方案將成為主流。這可能與拉丁美洲最低限度的授予和所有這類或其它的國家都抱持的目標[3]——即打擊同時政治地管理貧窮——有關；或者也與極其刻薄的德國失業津貼——也有Hartz IV 的說法——及其勞動福利原則有關。種種這些在一個日益富裕的不平等世界裡其實都是虛偽的。誠然，像德國新的、優化的公民財（Bürgergeld）可能在為應得的失業人士提供少量資金和更慷慨的普遍條款之間，最終指向一條新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儘管受到基督教民主黨的堅決抵制——另見最近意大利梅洛尼政府更為刻薄的無條件基本收入。總而言之，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變革將是有限的。

>>

> 未來

惟待時間證明：密涅瓦的貓頭鷹有可能只在黃昏時展開翅膀。但至少我們可以標記出一些似乎在過去幾年中已經展開並且可能會繼續加強的具體趨勢。無可否認地，這一切都取決於思想和計劃以及也別是政治鬥爭的開展，儘管後者的結果往往指向同一個方向。世界各地的發展至今仍是發展不平衡的。

我們可能希望這種改變會在人類史上引入一個更為慷慨、綠意盎然和團結的時代。不過這看起來似乎不太可能；然而這不意味著現代性的新階段，或第三階段的一個拐點不會發生。不論如何，它的終極方向仍是不確定的。■

來信寄至：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jmdomingues@iesp.uerj.b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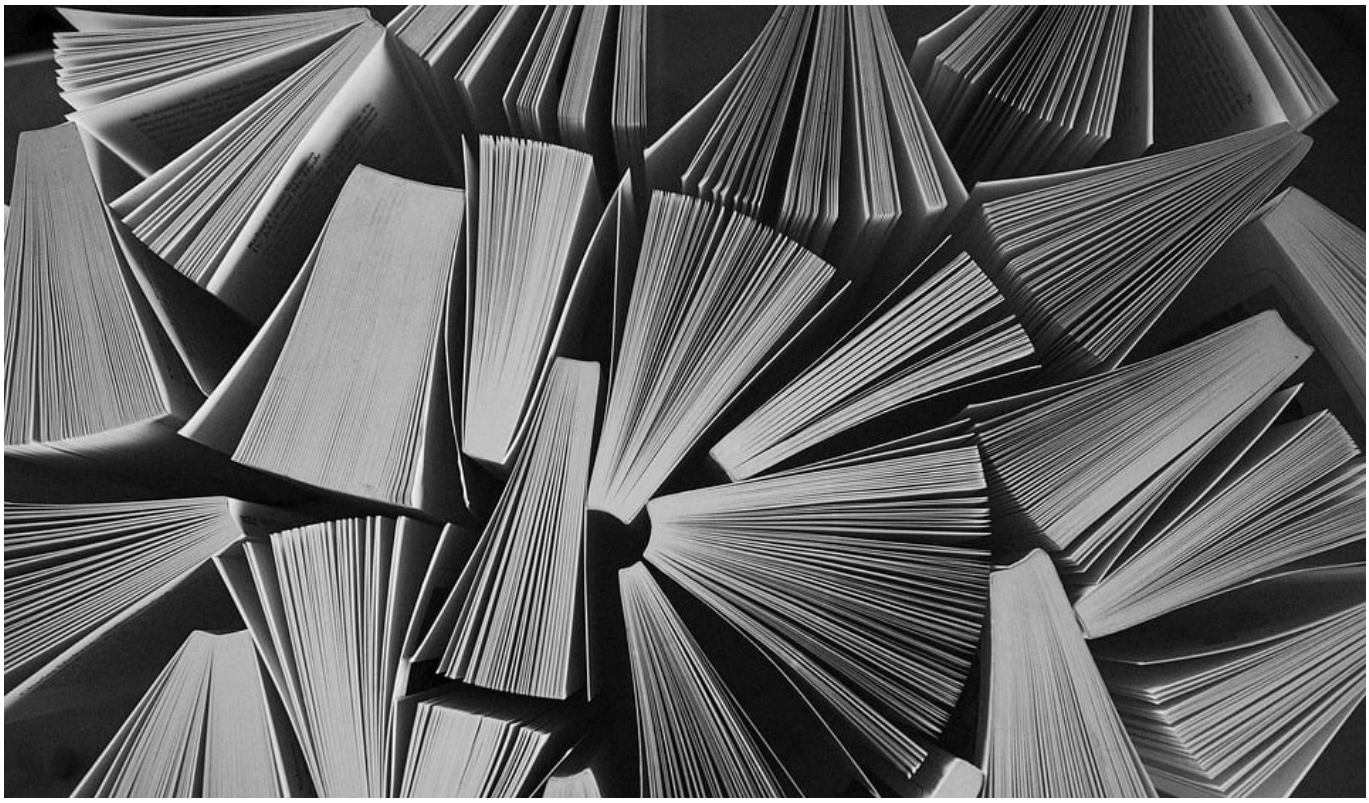
註1. Domingues, José Maurício (2020), “From global risk to global threat: State capabilities and modernity in times of coronavirus”, *Current Sociology*, 70(1), 6-23.

註2. Baumgartner, Frank and Jones, Bryan (2009) *Agendas and Instab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註3. Domingues, José Maurício (2019) “Social liberalism and global domination”. In: Heriberto Cairo and Breno Bringel (Eds.) *Critical Geopolitics and Regional (Re)Configurations: Interreg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49-62.

> (重新)開放社會科學:開放科學的挑戰[1]

Fernanda Beigel,國家科學與技術研究理事會以及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uyo,阿根廷,ISA歷史與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08)指導委員



來源:Pixabay。

1996年,ISA前主席 Immanuel Wallerstein在著名的古爾本基安委員會的報告中,呼籲國際社會重組社會科學。該報告對這些學科在19世紀的發展提出質疑,當時這些學科伴隨著歐洲殖民國家的發展,將這些特殊經驗與觀察視作所謂的普遍理論結構。這些學科的整合與制度化規定,不同的學科應擁有專門的方法論,這強化了社會分析間的隔閡。在「開放社會科學」的口號下,該報告指出應拋棄歐洲中心主義,並促進多語制、跨領域、以及研究過程的公開透明與國際合作。

近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開放科學議案》,此議案借鑑了相似的顧慮,並著力於開放研究成果(藉由開放出版物的權限)與研究過程(藉由開放資料權限)。開放科學涵蓋了所有科學學科與所有面向的學術實踐,包含基礎與應用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它強調傳統科學對不同知識體系開放的必要性。它也倡議與不同的社會領域合作,以及積極參與社會(公民科學)的相關問題。

這兩個全球計畫的發布時間隔了25年,其主要區別在於開放科學的數位化特徵,以及透過基礎設施的協作來強調研究過程的開放性(開放資料、開放評估)。另一方面,這兩個計畫的共通點,在於影響知識流通過程中結構性的不平等的關注,以及確保認識論多樣性與多語制的必要性。

>>

> 對社會科學資料公開的維護

由於其認識論的特徵、與研究對象的關係、以及調查方法，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對開放科學計畫提出了具體的挑戰。不加選擇地公開研究過程與其收集的資料，將影響個人隱私，並可能危及次級社群。然而，道德規範、「保護個人資訊」等規範及關於個人資訊使用的國家法規都爲這方面提供了充分的保障，這也是為什麼有必要反思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對共享研究資料的抵抗。

在不太習慣團隊合作的學科中，這種抵抗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擔心失去工作的知識產權，或降低個人在學術或理論上的成就獲益。正如「硬」科學的情形，人們承認科學的社會價值，但難以接受由公共資助的研究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共享研究資料最直接的意涵，是「知識是一種累積」，因此我們應該避免不同的研究團隊重複搜集相同的資訊。在這個領域也有一其他的聲音，認為公開特定涉及個人資訊的研究資料，可能造成研究對象被辨識，而這本來就是經驗研究的一部份缺陷。

向科學界公開提供資料並產生協作基礎設施的主要優勢之一，在於這些平台具有相互操作性，可以整合每個數位物件的製作者、其機構、項目與資料的開放權限。機構儲存庫在數位物件的管理中起到基礎的作用，不同類型的資料集與科學產品能夠與學術評估存放在一起，作為其品質的保證。開放評估是開放科學中尚未在全球範圍達成共識的一個面向，它能夠促進知識對話，也有助於解決學科中普遍存在的意識形態對立或理論爭議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最後會成為文章出版的一大挑戰。

然而，開放科學不僅只預告了其優勢，英語作為操作性代碼的主要使用語言也加劇了不平等，強化了英語科學傳播的過度同質化，也可能危及文獻多樣性。同時，主要在歐洲地區，透過如「聯盟S」的「S計畫」與對直接收取作者費用（文章處理費：APCs）等程序，使他們得以更快速地獲取科學出版物的開放權限。為了維護出版商極高的利潤，APC的金額逐步攀升，這已使得霸權國家與非霸權國家的研究人員間產生了更大的斷裂。開放科學計畫是一個充滿張力與搏鬥的持續建設。

> 質疑歐洲中心主義，實施情境化開放科學

重新審視由 Gulbenkian Report 協調出的《古爾本基安報告》，其所發起開放社會科學計畫，有可能讓一個計畫重現生機，這個計畫旨在質疑歐洲中心主義與殖民主義知識體系的基礎，而這樣的體系也是開放科學計畫的一部份。同時，這個計畫也指出，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在本能夠更踴躍的計畫中顯得有些邊緣。無論是民族誌動力學，或是與弱勢社會群體共同生產知識，社會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研究特殊性，使得共享研究資料變得困難。造成這些困境的原因有許多，與個人或組織相關的資訊，以及其所建構的資訊類型具有高度敏感性，這些訊息有時只能在機構儲存庫的共享資訊集以特定形式被存放。

在這個意義上，機構層面的設置能力對於回收所有標準設定，與普及開放科學準則和良好的實踐至關重要。此外，研究者必續做出更重大的承諾，以推動開放公共資助的研究資料，並修訂開放資料集，將其脈絡化，使其能夠應用於每個研究領域的特定需求。

開放科學的一個主要面向——公民科學——為社會科學中參與性科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與實踐空間。幾十年來，拉丁美洲發展了參與性科學的理論傳統與方法。除了 Fals Borda 的貢獻外，Paulo Freire 的《公眾教育》和《南方認識論》等實踐也是重要里程碑。自20世紀初以來，大多數拉丁美洲大學一直在實施推廣計畫（第三個任務）。大學與社會間的互動提供了促進知識共同生產的實踐累積，也建立了擴大開放科學參與性的進程。

在這個意義上，參與性科學的新穎之處並不在於某些社會群體被「邀請」與科學家合作，而是在於它與科學權利與審查權利相關。要使參與科學有效地開放，並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加以行使，我們必須意識到，研究人員並不持有以公共資金來蒐集到的資料的所有權。最重要的是，參與社會研究的社區不能僅僅作為被採集資訊的人，卻沒有處理與解釋的權利。

公民科學並非社會科學的特權。相反的，調查經驗大多與環境科學有關。但在世上的某些區域——主要是較邊緣的地區——有建立出一套參與性行動科學的傳統，這種科學提供了一系列可以推廣的方法論原則。在大學層面，在批判性擴展傳統中累積了一系列的常規與經驗，這代表著發展公民科學與多元大學知識的重要累積。

> 民主化、資訊正義和消除不平等

為了促進科學的開放性與參與性，我們必須打破資訊不對稱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開放研究過程需要更加明主的治理體系。原住民資料治理原則CARE（集體利益、控制權力、責任、道德）提供了一個

>>

概念框架，藉此能夠扭轉學術團體與社區在科學實踐中歷史性的權力失衡。儘管如此，評估與援助系統仍需要具體的行動與獎勵措施，並依據不同社區的需要在機構層面加以考慮。

數位基礎設施的全球不對稱、知識流通的語言、與學術聲望的累積，對每個國家和地區的科學開放條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而言，Wallerstein的計畫和開放科學計畫之間的對話在今日變得更有效益。若要持續下去，需要一些與科學去殖民化相關的反思，為全球南方制定開放的科學政策。我們勝制可能需要設想一種新的學術外交形式，將科學學界中多元的行動者聚集在一起，如國家專業協會、區域網絡、出版商、學生、圖書館館員、研究人員與國際組織。

開放研究資料並使其能夠自由取用，以供共享和再次使用是開放科學的核心問題。但它無法保證這些資訊的互相操作性，也無法確保社會對研究成果的利用，與研究成果與特定社會的關聯。當今科學發展的邏輯與基於「主流」生產模式的全球學術體系聯系在一起，這種模式在各個層面都有可議之處。為了在學術界取得進步，需要進行許多討論，推翻原有的廣泛信念。

由於其特殊性，單獨分析原住民傳統知識的開放性是至關重要的，這是教科文組織在制定《開放科學議案》期間著重討論的主題。在為此目的兒招開的全球協商會議上，原住民社群對此提出批判，表示這其中意涵著強制開放原住民知識的觀點，這使得《議案》有了重大的修改與新的措辭。有一些研究也指出傳統原住民知識的提取和商業化的過程，甜菊糖是巴拉圭瓜拉尼家族知識貢獻的典型案例，位於Amambay 山脈中，他們發現了甜菊的存在、其具有甜味的特徵、其生展地點與生長訊息。根據帝國大都市科學機構制定的規則與程序，人們對其進行徵收與加工，將這種蔬菜投入資本主義經濟理性中，會有利於開發的過程。在向其他知識系統開放科學時，必須重申《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2007)的議案，以及原住民部落對其傳統知識的自主與不可剝奪的權利。

相應地，科學政策在地方、國家與區域的錨點，在各個維度上將科學主權至於非霸權國家公共議程的前沿；例如，商業平台或出版商取用資訊的反饋、原住民知識的自治政府、以及在全球標準與地方研究標準之間的脈絡平衡中討論科學的社會相關性。我們要意識到，基礎設施的不對稱是促進認識多樣性的一個關鍵因素。同樣的，我們也應該制定政策，消除知識生產過程中的社會不平等，以及知識流通中的種族、族群、障礙或性別的不平等。這些不平等是多標準的，我們必須找到解決方案，以促進能達成社會、認知、和資訊正義的開放科學。■

來信寄至:
Fernanda Beigel <fernandabeigel@gmail.com>
Twitter: @BeigelFernanda

註1.這篇文章的英文完整版即將在全球觀點期刊的特別刊「拉丁美洲的社會科學」上發表。

> 多元社會學的南方概念

Mahmoud Dhaouadi，University of Tunis，突尼西亞，ISA 歷史社會學（RC08）、宗教社會學（RC22）、語言與社會（RC25）委員會成員

“總社會文化影響力（TSCI）是一個現代社會科學中不會使用到的概念，可以將其定義成是一種，會全面影響到社群或社會中每一個人的社會文化影響力。也就是說，沒有人能偏離 TSCI 的規範，這與認為社會文化規範中的偏差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主流社會學觀點背道而馳。在美國確實有許多關於偏差行為主題的出版物和大學課程，而正是在這種強調偏差的人類社會背景下，我分析了兩個社會文化規範中不會出現偏差行為的例證。第一個是在突尼西亞社會裡，另一個是在所有的阿拉伯穆斯林社會當中。因此，我的 TSCI 概念正是與當今日益增長的「多元社會學」和「去殖民化社會學」站在同一陣線上。我對 TSCI 的概念是出於以下兩個特定現象的觀察。

> 禁止飼養雌性動物

調查指出，突尼西亞東北部（Ras Djabel、Rafraf、Ghar El Melh、Sounine、El Alia 和 Meteline 等城鎮）嚴禁飼養母騾、母馬、母驢。從該地區的社區規範可以看出，飼養這些雌性動物的行為會是一種難以接受的社會醜聞。城鎮居民的這些深根蒂固且廣泛存在的社會文化規範，甚至使他們避諱於使用女性名稱來稱呼非生命體。例如，他們用陽性名詞「camion」（卡車）取代了陰性名詞「camionnette」（麵包車）。 這些社會文化規範對該地區所有居民的行為都產生了全面性的影響：所有居民都只飼養公騾、公馬和公驢。

正如前所說，在當地文化中飼養這些雌性動物是可恥的。即使只是在公共場合提及或談論雌性動物，也會被以尷尬或暴怒等負面情緒回應。當地拒絕飼養雌性動物的文化，使得當地人對突尼西亞或突尼西亞之外的地區中，與此事相關的現有社會文化規範漠不關心。

為了解釋這一現象，我的假設是該地區的土地無法滿足大量動物下的需求，更不用說雌性動物可能會讓潛在的需求持續增加。此外，當沒有拖拉機、卡車和汽車時，居民確實需要一些動物來耕種他們的小塊土地並搬運物品。在這樣的背景下，只飼養雄性動物就成了最佳策略。

> 男性的割禮

應用於飼養動物的 TSCI 概念也可以更廣泛地應用於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所有突尼西亞穆斯林都在全國各地實施男童割禮的習俗。也就是說，突尼西亞所有階層（底層、中產和上層）的家庭都沒有例外。事實上，這裡並沒有任何餘地能夠偏離割禮的社會文化規範。

> 社會學觀點

我對這兩種現象的分析揭示了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在第一種情況下，突尼西亞東北部的所有居民都拒絕飼養母騾、母馬和母驢；在第二種情況中，所有突尼西亞穆斯林都參與了男性割禮的實踐和祝賀活動。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兩種現象強調了男子氣概在突尼西亞社會中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突尼西亞東北部社區。

TSCI 的行為，作為一個在當代西方社會學文獻中幾乎找不到的新概念出現。已故的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美國社會學期刊中攥文時，似乎並未意識到這裡所解釋的 TSCI 概念：「我們可以提出並沒有一個群體文化規範（所有層級）會被所有成員完全遵守的假設。」

他的主張並未反映在本文中舉例的突尼西亞社會和阿拉伯穆斯林社會的文化規範中。如前所述，阿拉伯穆斯林和西方社會之間潛在的文化差異，與當今去殖民化社會學和多元社會學中越來越高漲的呼聲正是彼此呼應。因此，社會科學家有理由問：TSCI 能應用於非阿拉伯穆斯林群體或社會中嗎？

不管這個問題的答案如何，對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說，理解和詮釋前面例子所述的強大 TSCI 的形成原因非常重要。想要知道這個難題的答案，就需要研究人類社會中的文化系統和社會結構。上述的例子都提高了本文主要假設中的可信度，強調了突尼西亞和阿拉伯行為中不可避免的 TSCI。■

來信寄至：
Mahmoud Dhaouadi
<m.thawad43@gmail.com>

> 拉丁美洲社會學與當代文明危機

大會宣言
拉丁美洲社會學學會
第53屆拉丁美洲社會學理事會

巴西藝術家和政治學家 Ribs（https://twitter.com/o_ribs 和 https://www.instagram.com/o.ribs/）為社會理論和拉丁美洲研究核心的社會運動觀察站（NETSAL-IESP/UERJ）所作的插圖。
來源：Ribs，2021。

在現今所面臨的全球危機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一方面正經歷著主導部門推動的計畫和其內部盟友的緊張關係，另一方面也與生存飽受威脅的廣大群眾其需求產生緊張關係。資本主義成長積累一種新的由邊緣社會融入全球市場的新形勢，而科技進步與製造方法的日新月異進入日常生活，在這其中亦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於邊緣社會而言，這意味著內部市場遭到破壞，如同分裂為一現代全球化中的一支，而絕大多數的人則淪為其體系下徒具功能性的消費者（其經濟活動根基於傳統形式的製造仍會存在，如一些非正式的工作或現代製造部門中的低階勞動）。

我們也正處於氣候與環境危機的歷史時刻，民主權利的挫折、軍事化的恐怖主義，以及在糧食、能源、移民和種族政治上等浮上檯面的危機。數十年來

>>

新自由主義已經捨棄了公共服務，該學說還劇烈地影響經濟之外的個人與集體良知和主觀意識。於此同時，我們的社會正因顯而易見地不平等而分裂，尤其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更為顯著。

> 在歷史關口的拉丁美洲

在這個設想上，我們認為這個區域正處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新形態，且必須建立一新的社會政治計畫來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一部分，全球地緣政治的重組、美國主導勢力的弱化與其他勢力的出現——特別是中國——在新的全球霸權爭奪上帶來了新的壓力。另一部分，多元政治與社會運動的蓬勃也了引發人們社會中不同的議題的重視，如女性主義、環境主義、兒少權益、反種族歧視與原住民族社會的未來。也就是說，這些新的可能性和生態社會轉型的具體烏托邦理想是藉由區域中的抗議和日常爭端所形塑的。

然而，這兩股互相敵對的勢力，其力量是相當不對等的。即便是在那些大眾已經擁有較大選擇權，甚至能夠影響政府的國家，權力項目仍然具有支配性。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這些由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驅動的社會經濟與文化進程，有著失敗的結果，但他們還是持續存在，並引導人類走向災難。民眾由過度膨脹的希望中獲得力量，但前述的進程導致大眾的政治力量受到限制、面臨挑戰。佔據霸權的部門急欲對自身將被削弱的力量做點什麼，而與支持民眾的勢力展開鬥爭，而人們則深陷在這場戰火中間，並經常因為期望未能實現而感到沮喪。

> 當代拉丁美洲社會學的角色

這就是拉丁美洲社會學在歷史上曾經做過的。我們必須去喚起，例如從成效顯著的散文創作風格轉型至科學性的社會學的標誌性創新、透過致力於社會學和行動研究來克服後者、藉由依附理論與政治生態學來質疑發展理論、女性主義的認識論創新，或透過拉丁美洲式的提議來重新詮釋社會運動藉此挑戰西方世界的理論霸權。這些創新，我們可以稱之為重建，來回應社會變遷。

在這一點上，去指出理論和實踐的改變中社會學必須去分析和理解複雜的全球和區域體系。我們必須去質問是否有改組 ALAS 工作小組的需要，和我們核心辯論中所思考關於氣候、貧困、發展模式、社會運動、文化和身份認同轉變或殖民等複雜問題的優先次序。

拉美和加勒比海社會的改變已在本文中大致描繪，並試圖鼓勵拉美社會學自我復興的同時，拯救過往70年來 ALAS 業已完成的批判性遺產。我們必須革新自身觀點和為了轉型工作所做的理解。我們也必須大力捍衛社會學、公立大學和在我們境內和世界上正飽受威脅、報復、監禁甚至遭到謀殺的社會學家。我們尊嚴地站出來和呼籲加入這場國際行動來強化與轉化我們所身處的學科環境。

本宣言避免直射任何一個國家或作者的名諱，只有一個例外即是：Pablo González Casanova，墨西哥偉大的社會學家和前 ALAS 會長，藉此紀念其身為社會學家所投注的心血結晶與慶祝其百歲誕辰。願其所致力的一切作為現在和未來世代的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社會學家的榜樣。■

墨西哥城，8月19日，2022年

> 破碎的巴西

Elísio Estanque，University of Coimbra，葡萄牙，ISA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RC47）研究委員會成員，與
Agnaldo de Sousa Barbosa，São Paulo State University，巴西

在一個較為熱鬧的街區，巴西國旗掛在衣服之間。
來源：Charl Durand，Pexels。

巴西嚴重的社會分裂已經眾所皆知，不過在最近的選舉爭議的背景下，筆者認為有三個面向的分析——即歷史、社會經濟和政治，可以幫助來自各地的讀者，理解該國目前面臨的矛盾和挑戰。

> 歷史

在首次傳教行動的500多年後，奴隸貿易和殖民制度對當地社會造成的殘酷影響，成了巴西菁英階級的起源，他們的帝國概念最終也滲入了自己的共和運動。獨立之後，帝國動蕩時期（1882-1889）演變成了菁英階級中不同分支間的激烈衝突，使得民族／國家歷程難以進行。第一共和國的出現，則取得了執政機關中保守部門的支持，當時他們仍對廢除奴隸制（1889年）心懷不滿，於是意圖將大眾排除在政治外。同時，與地主勢力密不可分的「coronelismo」所形成的社會趨勢，直到二十世紀 Getúlio Vargas 推動的變革之前，一直決定著巴西的政治形勢。在這次變革中，新的工業資產階級從1920年代開始擴張，並從老地主和咖啡種植主那裡繼承了透過剝削取得的「地位」，更承襲了「coronelismo」的獨裁精神。即便巴西在Getúlio Vargas 執政時期（1930-1945）向新企業家菁英靠攏而抱持的發展主義之下，經歷了工業化、城市化與國家進步；軍國主義仍持續著統治階級的菁英主義野心，最終導致了總統自殺（1954年），以及後來的軍武政權（1964年）。

> 社會經濟

社會經濟層面，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時，社會運動逐漸於巴西的政治議程中成為要角，為軍事政權的結束鋪平了道路，其中包括 Lula da Silva 為核心的新工會主義。改革的浪潮與 Lula da Silva 一派日後的行動，一同成為了推進民主的動力。即便如此，Lula 勢力的成功，仍然為機會主義往後的勝利埋下契機——Collor de Mello 最終促使中間偏右的巴西社會民主黨和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崛起。政府的成功經歷了一段時間之後，在「真實計劃」引入新貨幣的金融改革下，90年代末開始，經濟陷入了停滯，高額外債和有利融資的稅收政策，導致了社會不穩定、非正規勞動、低薪和不平等現象的增長。

> 政治

在當代的巴西社會，人們對於政治的意識是分裂的，特別是在選舉的時候。接下來，我將回顧一些巴西在政治制度上的細微、卻極為重要的差異。在巴西，其政權的型態可以說難以歸類。巴西政體的運作是由「總統制聯盟」這個不成文的規則所決定——仔細來說，就是總統權力的穩定很大程度取決於議會。也因此，這樣的政權雖是總統制，實際上卻沒有總統制的形式。用 Cicero Araujo 教授的話來說，這種運作形式是某種「無形的議院」，其自 Fernando

>>

Henrique Cardoso 時代以來，已經「非正式地成為國家權力的平行管道，與官方的所有運作互相交織。這包括各層級的政治代表和經濟勢力之間的混雜關係，特別是那些公共機關最為依賴的經濟力量。」此外，在巴西的投票中，如果是總統、聯邦議會、州長、州議會和參議院的大選，則需要同時進行多輪投票。這代表選舉中需要在峰會上進行多次談判、期間會發生持續不斷的討價還價與政治／經濟交易。也就是說，選舉過程中有許多介入操縱的機會，這就造成了人民對於政黨和民主本身失去了信任。

> 惡魔的選舉

最近的選舉論辯中，也反映著上述的分裂。事實上，這不僅是一場「思想的辯論」，而是一場選舉霸權的爭奪戰，其手段涉及了策略、結盟，以及民意調查。原先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利益對立，晉升為妖魔化選舉對手、不斷向對方施加壓力的摩尼教式論述。在雙方都被塑造成撒旦形象的情況下，仇恨情緒便成為了選舉結果的決定性因素。為了在由 Ciro Gomes 和 Simone Tebet 為首的「第三條道路」陣營落敗（他們在第一輪中僅取得7.2%的選票）之後重掌大勢，Bolsonaro 和 Lula 指責敵方候選人對國家、人民有惡魔般的意圖，進而動員基層民眾，並試圖吸引中間選民。如今巴西的政治就如同歐洲，恐懼和怨恨被當成選舉時的競爭武器。

> 失敗的仇恨與政變

在媒體、福音派教會和數位網絡（如微信）的協助下，經濟方面主要的利益集團（尤其是農商部門）被深植於當地社會的反工黨情緒感染。在這種仇恨論述中，其對象不僅包含工黨和 Lula da Silva，也針對所有與左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光譜扯得上關係的群體或階級。忙於面對即將到來的經濟退與生活困境，此時的一般民眾，早已沒有保留理性的餘力。為了解決經濟問題，Bolsonaro試圖採取孤立措施來控制燃料價格（即使這可能會犧牲國家提供給公民的服務品質），但仍然力有未逮。面對敵方勢力，Lula da Silva 沒有花太多力氣說明己方未來的政策——對他來說，回顧自己在第一次任期中為國家帶來的成功就很足夠了。當時，巴西人民——特別是窮人——在21世紀初親身經歷了所謂的「黃金十年」。政變的隱患於選舉前期潛伏了很長時間，但後來司法部門的主要機構（高級選舉法庭及院長 Alexandre de Moraes）站了出來，設法解決了激進武裝勢力可能造成的威脅。

> 路障與正常化

在 Lula da Silva 獲勝後，巴西社會瀰漫著一股強烈的緊張情緒，就連落選候選人也在選舉結束後超過兩天的時間裡，都沒有發表落選聲明。一些較為激進的社會團體，更在主要道路上設置了數百個路障，並在立法程序開始時，破壞了巴西的三個政府建築。藉此，民眾表達了他們對於 Lula 無視民主精神重返王座的憤恨，也挑戰了司法系統。許多意見領袖試圖透過輿論，將行動謀劃者的風向帶到 Bolsonaro 相關勢力身上。在此期間，代理總統一直與整起事件保持距離，但最終還是姍姍來遲地出面，呼籲要將抗議者遣散。雖然他的行為沒什麼說服力，不過還是平息高昂的反動情緒。從政府於制度層面轉型的努力，可以看出巴西正走在「正常化」的道路上，帶來了新的希望。這將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但並非不可能。■

來信寄至：
Elísio Estanque
<elisio.estanque@gmail.com>
Twitter: @ElisioE
Agnaldo de Sousa Barbosa
<agnaldo.barbosa@unesp.br>

> 伊朗：這不是抗議，是革命

伊朗之聲

支持伊朗抗爭的街頭遊行，口號為「婦女、生命、自由」，2022年。
來源：Flickr。

2022年9月13日，來自伊朗薩蓋茲的22歲庫爾德女性 Mahsa Amini，在德黑蘭被所謂的道德警察逮捕，原因是因為她穿著不得體。三天後，Amini 因在拘留期間遭到毆打而陷入昏迷，隨後在醫院死亡。

Amini 的死亡在伊朗各地引發了新一波的抗議浪潮。抗議活動不僅要求終結性別隔離，還號召眾人推翻伊斯蘭共和國。由於伊朗政權的諸多弊端和改革派的背叛，使得抗議者不再相信改革。他們要爭取的是革命。

> 伊朗的抗議浪潮

作為當前抗爭運動的一部分，許多年輕女孩和婦女藉由摘下頭巾並在公共場合焚燒的行為，表達她們反對國家強制的面紗規定和其對女性身體的控制。儘管在過去四十年中，女性在抗議活動中是積極又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性別問題本身從未被列入抗議活動的議程——除了1979年的抗議活動，當時女性抗議政府強制戴面紗的立法計畫。回到現在，學生在這次抗爭運動中提出的第一個訴求，則是廢除大學食堂的性別隔離措施。

在這場運動中，看得見年輕女性在公共場所抗議的身影，以及以「婦女、生命、自由」的強力口號作為中心的理念，還有在大眾文化和藝術生產中女性和性別的主導符號，再加上性別議題也被牢牢列入議程中；但抗議者的訴求非常多樣化，而且不限於女性或性別議題。這場抗議運動特別集結了來自不同世代、社會、種族、信仰和地區的伊朗人，當然也不分每個人的性別。來自全國各地的男學生、教師、醫生、商人、工人或平民都加入了抗議和罷工。因此，可以說我們正在目睹一場動員龐大的社會運動。

面紗的難題是伊斯蘭共和國自1979年以來未能解決的眾多問題之一。為了維繫伊斯蘭的認同與特質，政府嚴格控管了強制戴面紗和性別隔離等議題；但卻發現自身陷入了僵局，無法做出任何調整或法律修改——儘管大約一半的伊朗人口都反對強制戴面紗。

該政權的許多政治、社會和經濟弊端以及管理不善的例子，使許多伊朗人不滿、沮喪和絕望。他們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1年抗議失業、汽油價格上漲、水資源不平等、空氣污染和經濟管理不善等問題。Mahsa Amini 的死亡是壓垮幻滅的伊朗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抗議者不再要求改革或改善體制，他們也不再相信改革。從1990年代末到2009年的綠色運動期間，可以看見關於法律轉型、政治改革和女性權利的激

>>

烈討論；但隨著許多改革派人士遭到殘酷鎮壓、逮捕、軟禁、酷刑和逼供，改革的時代就這樣戛然而止。

>「我們不再害怕，我們要戰鬥」

2022年11月，司法機構負責人Gholam Hossein Mohseni-Ejei 邀請抗議者坐下來談話。他說：「我準備好了，讓我們談談。如果犯了錯，我們可以改過自新。」但抗議者卻是將他的作為視為另一種背叛的計謀。他們以諸如「這不是抗議，是一場革命」之類的口號回應。

抗議者甚至號召終結伊斯蘭共和國。他們高呼「獨裁者去死」或「Khamenei 去死」，並在牆壁和旗幟上寫下「我們不再害怕，我們要戰鬥」，以表達他們的無畏和決心。抗議者聲稱他們正在引領一場正在醞釀中的革命。許多象徵伊斯蘭共和國的重要標誌已被摧毀或燒毀，其中包括警察局和巴斯基站、寫有像是「伊斯蘭共和國街」或「巴勒斯坦」的街道標誌、伊斯蘭共和國創始人Ruhollah Khomeini及伊斯蘭革命防衛隊（IRGC）指揮官Qasem Soleimani的雕像，以Khomeini和現任宗教領袖Ali Khamenei 的旗幟和照片。

伊朗政權在抗議前三週的反應出奇地緩慢和猶豫，這可能是受到9月底在紐約市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的影響，亦或是 Khamenei 可能選擇默不出聲，以隱身於公眾面前來應對。

國家在整個抗議運動中的一系列回應手段，正顯示出這個政權的專制性質。其中包括：封鎖網路、策劃豐富的親政府遊行運動、用橡膠子彈和漆彈射擊抗議人群、 逮捕抗議者和藝術家、詆毀抗議者的名譽、破壞鳴喇叭支持抗議的車輛、抨擊伊朗僑民、將抗議活動歸咎於外國勢力、歪曲事實及口號和事件。

儘管監護委員會和專家會議成員Ahmad Khatami 或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 Hossein Salami 等國家官員，威脅要對抗議的伊朗人作出處決等嚴重的處分，但抗議活動並未減弱；甚至在首批囚犯遭受酷刑、強姦和處決的案件公開後也沒有。

在伊朗抗議運動僅僅只過了幾個月的情況下，要知道抗議活動會如何發展還為時過早。絕大多數沉默和缺席的伊朗人以及持不同政見的神職人員，何時會加入示威活動還有待觀察。與此同時，出現了（一群）領導人，他們開始建立組織和聯盟，並針對推翻後的結果提出了幾項具體的要求。在經過國際社會上曝光度最高的初期之後，這些抗爭往往進入常態化並在世界各地的新聞版面中消失。這種情況是否會再次發生以及國際社會對伊朗政權的立場將會是如何，還有待觀察。■

來信寄至全球對話編輯團隊：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PUBLICATIONS

GLOBAL DIALOGUE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isagdmag

www.isa-sociology.org